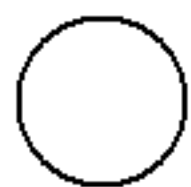


红旗



一九七四年 6



红旗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一九七四年第六期 目 录

短评：**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5)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孔丘的仁义道德与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 燕 枫 (8)

人民英雄不容抹煞

——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歪曲和诬蔑..... 甘 清 (14)

论商鞅.....

梁 效 (22)

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武鸣县委员会 (30)

在斗争中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

..... 山西浑源县刁窝大队党支部 (34)

培养积极分子 深入批林批孔

..... 青海共和县蒙古大队党支部 (38)

从“天马”看林彪野心家的世界观.....

靳 南 (42)

尊孔是为了复辟和倒退

..... 河北献县南河头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本林 (45)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庄 宁 (49)

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柳 彤 (53)

文化大革命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河北大名县杏现大队党支部 (57)

批林批孔推动了技术革新

——天津自行车厂的调查报告 (61)

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

.....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党委会 (66)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英雄光辉照银幕

——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江 天 (70)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

——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方 进 (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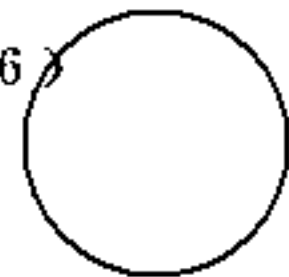
来自群众斗争生活的艺术

——谈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创作辛文彤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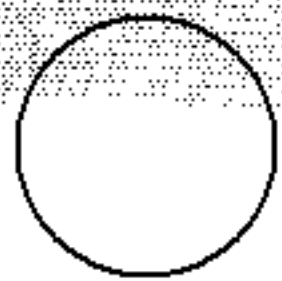
科学史研究

人类在变革物质中认识物质李 柯 (85)

☆ 六月一日出版 ☆



毛主席语录



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我们应当把世界进步的情况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传，使人民建立起胜利的信心。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



毛主席语录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做了决定，号召我们的同志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这个责任是担在我们的身上。



毛主席语录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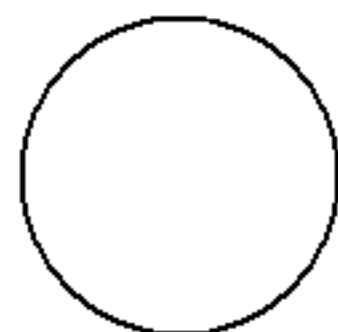
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

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毛主席语录

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在一九四二年，我们曾经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短 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正在深入发展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斗争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重要性。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作极大的努力。为了适应政治思想战线这种斗争的需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坚持下去，进行到底，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就成为一个不能忽视并且要用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理论工作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认真地研究历史和现状，从理论上正确地说明革命斗争中提出的实际问题，科学地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经验。这对于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毛主席早就指出：“**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正因为这样，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注意建立和加强理论队



伍，为党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也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建立和加强。批林批孔斗争既是发展理论工作的强大动力，也是培养理论队伍的最好学校。几个月时间的批林批孔斗争，仅就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历史知识，提高对古代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来说，在广泛性方面，就比多少个文科大学所能做到的还要多。为了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弄清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密切联系实际，刻苦钻研问题，不断进行学习、批判、再学习、再批判。许多同志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反复学习了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学习了怎样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习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包括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批孔的许多重要论述。在这过程中，逐步提高了人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理论重要性的认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

理论队伍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是要在政治思想上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我们要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出有战斗力的理论队伍来。认真看书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相结合，**从战争学习战争**，应当是我们培养理论队伍的主要方法。只有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理论队伍，才能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进行深刻的科学的批判，真正攻克敌人的思想堡垒，不断夺取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革命的新胜利。只有用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理论队伍，才能促进“**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善于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加以检验、丰富和发展。



要在各条战线上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也要建设同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的专业理论队伍，并使他们同工农兵理论队伍结合起来，以大大提高我们整个理论队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

理论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并且要长期坚持下去。学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和首先的是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掌握这个无产阶级的锐利思想武器。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战胜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战胜孔孟之道。开展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革命，有许多工作要做，能不能把这些工作做好，决定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决定于我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对理论队伍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理论队伍是否符合革命斗争需要的标准。我们应当努力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

培养理论队伍，需要全党动手。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订出具体规划和措施，认真实施。批林批孔运动中，在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等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其中有些已经作出了较好的成绩，应当注意发现和培养。同时，要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更好地完成我们党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各地都有一些在批林批孔斗争实践中组织和加强理论队伍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对于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如何深入，应当在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有一个大体的规划。我们相信，通过批林批孔，一定会较快地培养出一支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理论队伍，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出贡献。



批林批孔 反修防修

孔丘的仁义道德与 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

燕 枫

鼓吹孔丘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是林彪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深入批判林彪在这方面的谬论，看看他是怎样把孔老二反动腐朽的思想拿来为其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极右实质的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严厉地指出过：“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论持久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阶级敌人要把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搬过来，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必然要竭力掩盖它的反动阶级本质，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林彪正是这样干的。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在他的黑笔记里，就把孔老二的“德、仁义、忠恕”叫做是什么“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胡说什么孔丘的“仁、勇、智”就是讲“团结”，讲“斗争”，讲“唯物论”，并叫嚷要“用其内容”。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它是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又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人们的善恶观念和道德原则也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所谓永恒的、超阶级的道德是根本不存在的。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



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反杜林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我们摈弃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来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青年团的任务》）

被林彪称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要继承其内容的孔老二的仁义道德，到底是哪个阶级的道德观呢？

孔老二的道德核心是所谓“仁”。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地方就有一百多处。什么是仁？这个政治骗子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在孔老二看来，仁与不仁，道德与不道德，完全是以“复礼”，也就是以维护和复辟奴隶制为标准、为转移的。所谓忠、孝、节、义之类，不过是“仁”在各种关系中的具体应用。孔老二所说的“忠”，有其确定的阶级内容，就是要人们忠于奴隶制政权，忠于各国国君和周天子，死心塌地地为奴隶主阶级卖命，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所谓“孝”，就是要人们绝对服从宗法的家长制的统治，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在家，作专制家长的奴隶；在邦，作天子或国君的顺民。所谓“义”，是指行为要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反对任何损害奴隶主贵族的“犯上作乱”现象。至于被孔老二奉为“天下之达德”的“知、仁、勇”，从道德方面来说，也完全是为其“复礼”的政治目标服务的。正如孔老二自己所供认的，他提倡“知、仁、勇”，就是为了“修身”、“治人”、“治天下国家”，使奴隶制永世长存。可见，孔老二的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道德信条，是日趋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这一套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加以继承改造，成为维护反动的地主阶级专政、毒害和欺骗劳动人民的精神武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一再宣扬这一套。林彪宣扬这些东西，只能表明他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林彪鼓吹孔老二腐朽不堪的仁义道德，就是要“用永恒的绝对的道德原则的观点来提出自己的一切政治要求”，推行其“克己复礼”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妄图抹杀和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不是狂热鼓吹孔老二的“德、



仁义、忠恕”，可以作为“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吗？不是在伪善地侈谈“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以“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对待一切人吗？在林彪这些反动的说教里，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界限，社会主义时期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复辟的严重威胁，统统不存在了。正象恩格斯揭露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林彪这个妄想把无产阶级专政“吃掉”的野心家，竭力宣扬这种“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的“老调子”，其目的就是用反动、虚伪的阶级调和论，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在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反党集团所以要鼓吹孔孟之道，疯狂地咒骂秦始皇和法家，完全是为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对叛徒、特务和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服务的。

道德作为一定的阶级意志的直接表现，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剥削阶级总是要利用旧道德来掩盖他们凶狠、阴险的真面目，掩盖他们推行反动的政治路线。我们摒弃孔老二的一切道德说教，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剥削阶级的利益，为维护和复辟反动没落的奴隶制服务，为维护和复辟走向灭亡或已被推翻的一切反动没落的剥削制度服务。林彪一伙是国内外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阶级本性是极其凶恶和极其虚弱的。他们要把中国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深渊，要让被打倒的阶级敌人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他们所干的这种反革命事业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需要欺骗，需要伪装，需要利用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来为他们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服务。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对于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仁义道德的反动目的，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

林彪推销孔孟的仁义道德，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王明、刘少奇等都曾经贩卖过。林彪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积极配合国民党，篡改马克思主义，宣称“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



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不仅如此，陈伯达还竭力吹嘘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声称只要改一个字，变成“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就能使这个“封建社会的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这完全是鼓吹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胡说八道。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之间，只有“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或“人所不欲，要施于人”，而没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帝国主义者妄想灭亡中国，“不欲”自己被赶出去，我们就要把这个“不欲”施于它身上；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吃掉共产党，“不欲”解放区的巩固扩大和人民军队的发展，我们就要把这个“不欲”施于它身上。没有这一条，还有什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抗日战争的胜利？反之亦然，我们“不欲”的一切，国内外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要施于我们身上。抹杀了这一点，就是抹杀了阶级斗争全部的历史经验。总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好，本质上完全一样，都是剥削阶级用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的谎言，反动统治阶级本身谁都没有实行过而且根本不准实行的。所不同的，只是后者比前者多了一层近代资产阶级所常用的超阶级的色彩罢了。今天，林彪又袭用机会主义者所惯用的手法，把反映古代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和需要的道德，“转变”为适应现代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需要的道德，并给它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然而也正在这里，充分暴露了林彪一伙是地地道道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货真价实的政治骗子。

除了企图欺骗、麻痹革命人民以外，林彪贩卖孔老二反动的道德信条，还有一个目的，即用它来威胁和强迫其一小撮死党，以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拿“忠”来讲，就是要林彪的死党去干叛党叛国，危害毛主席、党中央的坏事，“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家父子。再说“孝”，就是要他的法西斯小舰队按照“事父母敬而不违”、“以从亲之令为孝”的精神，对林彪的反革命旨意曲意逢迎，言听计从。而所谓“仁”和“义”，则是要他的死党以反革命的共同利益为重，紧密勾结，即使失败了，也要“不成功便成仁”，如此等等。总之，是要以孔老二的仁义道德作为反革命内部纪律，统一其死党的思想和行动，使他们服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指挥，死心塌地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效劳。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以一小撮反动派的主观幻想为转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不



管林彪怎样乞灵于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妄图以此“统一”其死党的意志，为在中国搞反革命政变服务，其阴谋是决不能得逞的。看吧，林彪及其死党在策划反革命阴谋时，总是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什么仁义道德也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虚弱与恐慌。林彪不是要他的死党“不成功便成仁吗”？可是，当反革命“联合舰队”覆没的时候，带着花岗岩脑袋去“成仁”的，真是寥寥无几。就连林彪这匹“独往独来”的“天马”，在“不成功”时也决不肯“成仁”，而是仓皇逃命，狼狈投敌，可耻地投奔苏修，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最后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由此证明了所谓仁义道德的彻底破产。

毛主席说过：“**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为人民服务》）无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先烈们为革命而英勇牺牲，这是比泰山还重的。而林彪为其反革命阴谋丧生，则是比鸿毛还轻。正象马克思批判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时说的那样的，林彪这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杀害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人民、投降苏修的叛徒、卖国贼，“**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论他们的教士们怎样祷告也不能把他们解脱**”。（《法兰西内战》）

正当林彪反党集团起劲地宣扬儒家道德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他们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解释孔丘，吹捧孔丘，把孔丘其人和他的反动思想吹到了天上。他们胡说孔老二的道德原则就是为了培养“君子”。而这种君子是“对于饮食、财富、生活舒适和物质利益漠然置之”，“毕生献身于崇高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探求真理”的“完人”，是“各种美德的综合体”。啊哟哟！真想不到，“君子”，这个两千年前孔老二心目中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理想人物，在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苏修眼里，今天竟然成为如此不可超越的“摩登圣人”，给加上了这么多的桂冠。然而，苏修叛徒集团把修正主义观点和孔老二的“君子”“合二而一”，竭力美化的卑鄙目的和手法，是欺骗不了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的。人们完全清楚，苏修叛徒集团吹捧孔老二的道德观，吹捧“君子”，首先是为了反华；同时，也是为了将这种“君子”树为修正主义的典型，把他们一小撮特权阶层打扮成道貌岸然的“君子”，以欺世惑众，维护其法西斯统治。其实，孔老二所说的“君子”，就是反动统治者的代名词，是和“小人”即奴隶相对照而言的。苏修叛徒集团声嘶力竭地吹捧“君子”，恶毒地咒骂所谓“追求荣华富贵的小人”，



不打自招地暴露了他们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顽固推行修正主义的叛徒嘴脸，证明他们象列宁所斥责的叛徒考茨基一样，“是糟踏马克思主义的头号伪君子”。（《第二国际的破产》）

孔老二的道德信条，贯串着一条黑线，这就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人性论。剥削阶级为了从思想上欺骗和麻痹劳动人民，在进行道德说教时，往往要搬出超阶级的“人性”作为伪装，标榜他们道德的“全民性”，妄图掩盖剥削阶级道德的阶级本质。正是在这一点上，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丘的人性论，曾为以后两个剥削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走向腐朽没落时一再利用，直至今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时候曾经指出，“各色英雄好汉都在道德哲学中为了真正的道德而各显神通。费尔巴哈为了人而爱人，圣布鲁诺爱人，因为人‘值得’爱，而圣桑乔爱‘每一个人’”。（《德意志意识形态》）林彪以及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也必然要贩卖这一套破烂。他们企图捏造出这样一种神话：敌对的阶级之间存在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道德关系，存在着“人类共同的感情”，存在着彼此发生共鸣的“忠恕”之心和“人类之爱”。苏修为了证明孔老二的仁义道德，是同他们长期以来宣扬的“人道主义”口号一脉相通，一再声称孔老二“仁的本质在于‘真正同情’别人”，“把任何人都看成成人”。但事实上，苏修叛徒集团从来都不把国内人民和世界人民“看成成人”，他们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对外实行侵略、扩张和颠覆，他们吹捧孔老二，正是为了在“人道主义”纱罩下面掩盖其社会帝国主义的面目。毛主席指出：“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对林彪和苏修鼓吹的仁义道德的批判，同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联系起来。

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一场尖锐的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决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仁义道德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要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要象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努力“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荡涤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污泥浊水，使共产主义道德更加发扬光大。



人民英雄不容抹煞

——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歪曲和诬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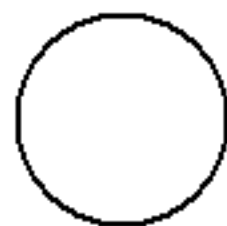
甘 清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奴隶起义的领袖柳下跖，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劳动人民和一些进步的思想家，都肯定跖，颂扬跖，怀念跖；而反动派和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则象当年孔老二一样，一提起跖，便吓得脸色苍白，惶恐万状。他们始则竭力诬蔑跖，攻击跖；继则歪曲史实，抹煞跖，否定跖，妄图否定跖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否认跖的批孔实有其事，把跖说成“子虚莫有”，从而替孔老二掩盖反革命罪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应当遵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历史唯物论的教导，彻底批判尊孔派对柳下跖的攻击诬蔑，肯定柳下跖在批孔斗争中的功绩，驳倒封建文人制造的反动寓言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柳下跖是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是批孔的英雄

春秋末期，柳下跖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被孔老二在“笔削春秋”时给一笔抹煞了。孔老二的信徒们为了替孔老二掩盖反革命罪行，更是竭力攻击、诬蔑柳下跖，并且不惜采取编造、歪曲历史的卑鄙手法，妄图抹煞、否认柳下跖。有关柳下跖的事迹已经被孔孟之徒搅得混乱不堪，柳下跖的形象更被他们糟踏得不成样子。尽管如此，只要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仍然能够拨开尊孔派们散布的迷雾，暴露出事物的本质：柳下跖确实是一位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历史上劳动人民中的批孔英雄。

柳下跖的具体生卒年月，已不可详考。综据各方面的历史资料，大体可以肯



定他是春秋末期鲁国北部柳下地区人。《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说柳下跖生得身材高大，目光炯炯，声若乳虎，英姿勃勃。他的思想象喷泉一样不循渠道，意志象旋风一样不受束缚，英武足以击退进攻的敌军，辩才足以驳倒巧伪弄舌的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在袭击奴隶主宅院的时候，他表现得机智勇敢。袭击前，必先进行详细周密的调查，弄清奴隶主榨取奴隶血汗得来的宝贵财物隐藏在什么地方；袭击时，身先士卒，带头冲锋；撤退时，不怕牺牲，沉着殿后；在决定是前进还是后退的关键时刻，能够当机立断；对于从奴隶主手中夺回来的胜利果实，分配得公平合理。由于他身上具有上述优秀的品质，因而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受到革命人民的尊敬。

相传柳下跖当时所率领的奴隶起义军多达九千人，驰骋天下，所向无敌，奴隶主贵族的军队望风披靡，莫敢与战。起义军所过之处，大小诸侯国的奴隶主贵族，无不吓得魂飞魄散，龟缩在城堡里不敢出来。奴隶主们一提到跖就非常头痛。

柳下跖生活于春秋末期，这个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动的伟大时代。虽然当时的奴隶制度已行将崩溃，但是，反动的统治阶级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就是我国古代史上被剥削阶级通过武装斗争，解决社会矛盾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使各诸侯国奴隶主武装闻风丧胆，于是作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孔老二，为了配合奴隶主对柳下跖起义队伍的暴力镇压，便亲自出马，去见柳下跖，妄图以“造大城数百里”，“尊将军为诸侯”作诱饵，骗跖放弃武装斗争，充当奴隶主的顺民。作为奴隶起义杰出领袖的柳下跖，不仅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在同孔老二面对面的舌战中同样是一位气吞山河的好汉。针对孔老二的丑恶表演，柳下跖手按宝剑，声如猛虎，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孔老二拚命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累累罪行，痛斥他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鼓吹“孝悌”之道“欲求富贵”的盗丘；“好面誉人”的“巧伪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说他罪大该杀，命他立即滚开！柳下跖一席话把孔老二吓得面无人色，目瞪口呆，



无言以对，狼狈而逃。

柳下跖同孔老二的论战，是革命同反革命、奴隶同奴隶主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正面交锋。跖代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真理在手，敢于藐视成汤、文、武之类的历代奴隶主头子，以及他们的“圣人”孔老二这样一些庞然大物；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深刻批判了孔老二鼓吹的一套维护奴隶制的吃人的旧礼教和旧观念，光辉照耀千古。

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先进的政治家、思想家在不同程度上反对过孔老二，但是象柳下跖批判得如此尖锐深刻的却不多见。这是因为跖所代表的奴隶阶级，生活在奴隶制的残酷压迫、剥削之下，最了解孔老二那套说教的反动本质。柳下跖痛斥孔老二的事实深刻说明：孔孟之道是劳动人民的死敌，而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劳动人民总是站在批孔、反孔斗争的前列。因为，劳动人民如果不首先起来冲破孔老二施加在他们身上的那套反动精神枷锁，就不会敢于起来造反。

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有着鲜明的旗帜。他大胆宣扬“先王”之行不足法、“圣人”之道不足贵的革命造反精神，坚决反对孔老二的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谬论；为奴隶们争取眼要看色、耳要听声、嘴要辨味、志气要满足的权利，反对孔老二的不合于礼不看、不合于礼不听、不合于礼不说、不合于礼不作的人身禁锢；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反对奴隶主任意压迫、剥削、摧残奴隶，过着不劳而获寄生虫生活的奴隶制度。正因为有着这种明确的社会要求，跖所率领的奴隶起义军才表现得立场坚定，目光远大，高官厚禄骗不了，武装镇压吓不倒。奴隶起义军不仅从经济上打击了奴隶主，而且从政治上动摇了奴隶制度，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柳下跖确实是一位领导奴隶起义的杰出英雄，从来没有任何一部书记载过跖是怎样失败的。《史记·伯夷列传》中说：跖“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吕氏春秋·当务》篇里记载：跖临死时叫人将铜锤放到棺材里，说如在地下遇见成汤、文、武等这些商、周的大奴隶主头子，将敲碎他们的脑袋。这番话充分表现了柳下跖对那些“先王”们的无比仇恨，对孔老二复古倒退思想的深恶痛绝。生前未能完成推翻奴隶制的革命事业，死后还要在地下和他们较量。看，柳下跖的斗



争精神是多么顽强彻底啊！

公元前一世纪，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在罗马史上写下了天翻地覆的一页。马克思称赞他“**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致恩格斯的信（一八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列宁誉之为“**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论国家》）柳下跖在春秋末期领导的我国奴隶大起义，不论就其起义规模、起义时间和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来说，都是可以同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大起义互相辉映的。柳下跖的起义，不仅在我国古代史上应当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世界奴隶革命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劳动人民永远铭记柳下跖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在劳动人民看来好得很！一些主张革新和进步的人士，也曾给予过它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是历代尊孔派则对柳下跖视若洪水猛兽，拼命地攻击他，诬蔑他。

孔老二的嫡传徒孙孟轲，胡说什么柳下跖的门徒是一些听到鸡叫就起床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奔波的人们；（《孟子·尽心上》）力图在秦国复辟奴隶制的大奴隶主吕不韦，把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贬为“开闭取楗”、钻穴逾墙的“小偷”；（《吕氏春秋·异用》）西汉尊孔派的代表人物刘向，诬蔑柳下跖“凶贪”；（《说苑·丛谈》）南宋尊孔派头子朱熹，在编辑《孟子要略》时，把《孟子》全书删了三分之二，但却没有忘记保留孟轲对柳下跖的攻击；清代反动文人俞樾，极其恶毒地辱骂柳下跖是“虎豹之属，贪骨之类”，等等。其实，历代尊孔派对柳下跖的上述攻击，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不过是孔老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唾余罢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反杜林论》）剥削阶级所谓超阶级的、统一的、永恒不变的道德，是骗人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无产阶级并不一般地否认人们的利益，而只是分析一个人的行为是代表着哪个阶级的利益。毛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革命就



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就是为了争得某个或某些阶级的利益。恩格斯指出：“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正是为了争取奴隶阶级翻身求解放的利益，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前进，对历史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孟之徒恶毒攻击柳下跖领导的起义军是“孳孳为利”，其罪恶目的，是为了替反动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制造反革命舆论，妄图使劳动人民永远在他们的剥削奴役下甘当顺民。其实，孔孟之徒都是疯狂追逐私利的吸血鬼，是一伙极其虚伪无耻的两面派。孔老二嘴里说什么“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实际上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孟子·滕文公下》）叛徒、卖国贼林彪，诬蔑劳动人民见面时只会说“恭喜发财”，而实际上他正是复辟资本主义、鼓吹“一本万利”的政治骗子。这就是从孔老二到林彪这些两面派所谓讲“义”不讲“利”的真面目。

毛主席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尊孔派为了搞复古倒退，反对革命，竭力攻击跖；劳动人民要反抗，要革命，热情颂扬跖。古代劳动人民对于柳下跖的这种颂扬本身，就是对尊孔派们攻击柳下跖的一个有力回击。

柳下跖领导奴隶起义的英雄事迹，早在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就已经在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法家代表人物荀况，在《荀子·不苟》篇里记述了这种情况，说：柳下跖的革命事迹吟咏长在人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为了获得自身的解放，敬仰柳下跖，怀念柳下跖，把他颂为英雄。南宋末年周密著的《癸辛杂识·宋江三十六赞》中就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对柳下跖的这种思想感情。他说：古代人赞扬柳下跖为革命人民的圣人，是因为他对于革命的信仰达于极点，能够出类而拔萃。在后世的一些民间戏剧、小说中，也有柳下跖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河南濮阳县、山西太原市郊的人民群众中，至今尚有许多关于柳下跖英雄事迹的传说。



由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在劳动人民当中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有不少起义的奴隶，打着跖的旗号聚众造反，打击奴隶主的统治。因此，后世就有了许多关于柳下跖坟墓和遗迹的传说，这些正是柳下跖活在劳动人民心中的证明。《庄子集释》、《史记集解》、《史记正义》、《后汉书注》等书记载：今山东省泰山和历城县东平陵、山西省平陆县“临河曲”，以及陕西省华阴县“潼乡”都有柳下跖坟。明代修的县志中载：今河南省濮阳县、山东省章丘县也有柳下跖墓。唐人段成式在他著的《酉阳杂俎》里说：“高堂县（即今山东省章丘县）有鲜卑城”，城旁有柳下跖冢，“冢极高大”，起义农民“尝私祈焉”。山西《太原县志》记载：今太原市南郊柳子谷山上，有柳下跖“插旗石”一块，“石上有臼，深三尺许”。总之，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柳下跖的英雄事迹，一直在劳动人民当中传颂不止。于是不仅鲁国有跖，齐国、卫国、晋国、秦国也都有跖，跖满天下。

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将永远作为古代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榜样受人敬仰。他的英名已经永远铭记在劳动人民的心坎中，流芳百世。而那些攻击、诬蔑柳下跖的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则象一切反动派一样，最终被劳动人民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封建文人制造的“寓言”说是一个骗局

柳下跖是一个确证无疑的历史人物。对于他的革命事迹，从战国到东汉的四、五百年间，虽然遭到孔孟之徒的恶毒攻击，但是并无一人提出过怀疑。西晋时期，随着孔老二在思想界反动地位的确立，为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主观唯心主义玄学占据了支配地位。尊孔派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视《庄子·盗跖》篇记载的柳下跖批孔事实如芒刺在背，坐卧不安。他们认为即使再继续对柳下跖进行更多的诬蔑，也抵消不了柳下跖批孔事迹在劳动人民当中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影响。于是，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玄学家郭象，便通过对《庄子》一书的注释，采取篡改、歪曲历史的拙劣手法，硬把《盗跖》篇说成是“寓言”，妄图否认柳下跖批孔确有其事，否定柳下跖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后来注《庄子》的人，由于多属孔老二的信徒，也



大都采用了郭象的说法。因而，一千多年来，从西晋郭象开始编造出来的这个歪曲历史的反动寓言说，就成为反动统治阶级所奉行的正统观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尊孔派们编造的这个欺骗了人们一千多年的反动寓言说，外表颇为吓人，但是戳开一看，则十分荒唐可笑。

郭象判《庄子·盗跖》篇为寓言的重要手法，就是把柳下季牵强附会为柳下惠，接着便武断地说：“展禽（即柳下惠）是鲁僖公时人，至孔子生八十余年，……不得为友，是寓言也。”然而，柳下季和柳下惠是两个人，这在先秦著作中是记载得一清二楚的。综据《左传》、《国语》、《论语》、《孟子》等书所载以及郑玄、赵岐等人注释，柳下惠姓展名禽（一说名获字禽），在鲁僖公时（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六二七年）任过司寇属下的士师（即“警视总监”下边的监狱长）。而柳下季则是孔子同时代人。《吕氏春秋·审己》篇说：“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韩非子·说林下》记载了与《吕氏春秋·审己》篇大体相同的内容，但将柳下季写成为乐正子春。而乐正子春是曾参的学生，（鲁昭公十九年《公羊注疏》）这是柳下季与孔丘同时代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庄子·盗跖》篇称“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本来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郭象硬把两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生拉硬扯在一起，这是对历史的公然伪造。

柳下季是孔丘同时代人，“柳下季之弟”柳下跖也是孔丘同时代人，这在西汉桓宽著的《盐铁论》、东汉许叔重作的《淮南子》注和明代焦竑写的《焦氏笔乘》中，都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庄子·盗跖》篇的注释者，则置这些记载于不顾，闭起眼睛硬说：“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是跖之为何时人竟无定说。……读者勿以寓言为实也。”“跖者，黄帝时大盗之名”的提法荒诞至极！黄帝是传说中的原始社会人物，那时怎能会有“大盗”（起义奴隶）？西周之前，尚无“盗”字，那时把劫掠财物的行为写作“寇攘奸宄”。（《尚书·周书·康诰》）“盗”这个字，是春秋时代才有的。它在《春秋》一书中，首次出现于公元前五六三年（鲁襄公十年），是专门用于对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行为进行诬蔑的。统



治阶级诬蔑柳下跖为“大盗”，正好说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发生在春秋末期，柳下跖与孔丘是同时代人。从史书记载奴隶社会阶级斗争发展的状况来看，象柳下跖领导的那样大规模的奴隶起义，也只有在公元前五五〇年之后才有发生的可能。

《庄子·骈拇》篇和《战国策·齐策四》都说柳下季和柳下跖是鲁国北部柳下地区人。郭象对于这些先秦古籍的记载视而不见，而对于东汉以后李奇的《汉书》注释则奉为至宝，说什么“跖，秦之大盗也”。“跖，秦之大盗”一语，在秦汉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根据。

尊孔派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故意散布迷雾，制造疑团，从而达到抹煞跖确有其人，跖批孔实有其事的反动目的。

然而，骗子的谎言怎能掩盖得住历史的真实。柳下跖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人物，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跖的名字和跖的革命事迹，在先秦两汉的著作中有着大量的记载。目前已经查到的就有：《商君书》、《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盐铁论》、《论衡》、《汉书》等十七部著作四十五篇文章。如果历史上从无柳下跖其人，怎么能够在四、五百年的长时间内有这样多的人写文章一再提到他？怎么有许多情节在不同学派的著作中记载得基本一致？对于这样众多的古籍记载，西晋以后的尊孔派们是推翻不了的！

《庄子·盗跖》篇，是后人根据劳动人民关于柳下跖英雄事迹的许多传说写成的。这样的作品，虽然难免会有某些细节的出入、后世语言和作者错误思想的混杂。但是，只要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具体的分析，是可以作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把握住历史的真实的。根据劳动人民传说写成的作品，比之孔老二的信徒们按照“合于道者著之，离于道者黜去之”（韩愈：《杂著·读荀》）的唯心史观炮制出来的官方“经典”，要可靠得多。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应该歌颂劳动人民的批孔、反孔斗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把孔孟之道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论 商 鞅

梁 效

商鞅是我国历史上法家的杰出代表。他所进行的变法运动，是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时代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由于尊儒反法思想的反动宣传，商鞅这位大有作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在很长的时期内却一再受到攻击和诬蔑。“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二千年”！（章太炎：《尴书》）叛徒、卖国贼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拾历代反动派的牙慧，恶毒咒骂法家和商鞅，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阶级内容，正确评价商鞅和法家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一

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本名公孙鞅，卫国人。他“少好刑名之学”，（《史记·商君列传》）年轻的时候，就跑到法家发祥地之一的魏国，在崇尚法家的魏国宰相公叔痤那里当一名家臣，研究和总结了李悝、吴起等早期法家的理论和变法经验。后来到了秦国，由于主持变法获得显著成功，当上了秦国的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并被封为商君。因此，历史上又称他为商鞅。

商鞅所处的时代，是新兴的封建制度取代腐朽的奴隶制度的社会大变革时代。那些反动的奴隶主贵族，被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杀得落花流水，人仰马翻。没落奴隶主阶级同人民大众、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新兴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统一要求同奴隶制分封制造成的割据状态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革命和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斗争，十分激烈。“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



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新民主主义论》）在当时这样一个“天下大乱”的形势下，社会向何处去？人们向何处去？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都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这就是当时“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儒家的孟轲，大言不惭，把自己比作“救世主”，狂叫：“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然而这个家伙抛出来的仍是一条“克己复礼”、让历史大开倒车的反动路线。其他各家各派的人物，也都拿不出切中时弊的有效办法。只有法家才看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向，而商鞅在和儒家的尖锐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学说，制定和实践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法家路线，适应了时代提出的任务，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纵观全局，我们可以看到：在同时期形形色色的政治家、思想家中间，商鞅是一位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人物。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和反动儒家之间的两条思想路线斗争，主要表现为主张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同主张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的斗争。儒家的祖师爷孔老二就是一个反对变革，主张“克己复礼”，倒退到西周奴隶制社会去的复古狂。与商鞅几乎同时的孟轲，继承了孔丘这条复古路线，主张一切按旧章程办事。他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咬牙切齿地诅咒历史上代替旧事物的新兴力量都是罪上加罪的大“罪人”，攻击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新生事物。针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商鞅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那种“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法古，不修今”的战斗口号，指出“法古”则落后于时代，“修今”则跟不上形势，坚决反对复古倒退，反对故步自封。他从“世事变而行道异”的历史观出发，提出了“适于时”，（《商君书·画策》）“恃其势”，“恃其数”（《商君书·禁使》）的原则，就是要认清时代的变化，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李悝、吴起在变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他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提出象商鞅那样鲜明和完整的变革路线。商鞅在创立法家思想路线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超过了他的法家前辈。

在政治路线方面，商鞅提出了“法任而国治”（《商君书·慎法》）的“法治”路线，和儒家的“礼治”路线鲜明对立。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超阶级的礼，也没有超阶级的法。儒家给“礼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从孔丘念“仁”经，到孟轲讲“仁政”，



仿佛“礼治”之下，一切都是“以德服人”，充满了人类普遍的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其实，那“礼治”并非不讲镇压和刑法。礼治礼治，“克己复礼”而治，就是要恢复周代的奴隶制度。儒家反对变法，要保护和实行的正是旧的奴隶主阶级的法。看，孟轲之流对于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活动是何等残忍：搞进步的统一战争吗？“服上刑”！要用最重最重的刑法。开垦荒地，发展封建经济，破坏井田制吗？也要重法处置。在这里，恻隐之心呀，仁爱之心呀，统统抛进茅厕里去了，“礼治”终于露出了它残暴的奴隶主阶级专政之法的狰狞面目。

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就比较坦白些。他公开主张“法治”，其本质就是主张变革，要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这是他分析当时社会矛盾得出的正确结论。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察要”，也就是要捉住社会时弊的要害。什么是“要”呢？他认为，当时社会的大问题就是“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一人耕而百人食”。从事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人太少，而游手好闲的人太多了。商鞅把社会上的游食者列为五大“奸民”，即“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这五大“奸民”，主要就是那些享受世卿世禄的奴隶主世家贵族，大工商奴隶主，以及那些为了维护旧制度到处奔走、钻营官职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这些人不但象病虫害毁庄稼那样挥霍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而且还在上层建筑领域里鼓吹礼乐、仁义，反对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商鞅对此尤为深恶痛绝，点名痛斥儒家“仁义、礼乐”这一套是危害人类的“虱”！他认为，当时最大的急务就是去掉这些“奸”和“虱”。商鞅的这一主张确实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随着奴隶制度的日益崩溃，寄生的奴隶主阶级及其腐朽的意识形态，就越来越突出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除掉这个社会赘瘤，才能使社会前进一步。

为了除掉“奸”和“虱”，商鞅提出以法和农战为主要内容的变法路线。就是充分发挥地主阶级专政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去奸之本”，以严厉的刑罚狠狠打击奴隶主阶级反动势力；另一方面采取重农抑商、奖励耕战等措施，以壮大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商君书·开塞》）这比起李悝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晋书·刑法志》）来，其不同之处是把主要打击矛头明确地指向没落奴隶主阶级。当然，李悝和商鞅的法治，



也包含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这是他们的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的。另外，商鞅“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的思想，闪烁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毫不含糊地公开主张用新兴地主阶级进步的统一战争去消灭反动奴隶主的诸侯割据战争，用新兴地主阶级专政代替没落奴隶主阶级专政，鲜明地反映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生气勃勃的革命锐气。

二

商鞅变法是商鞅一生的主要政治实践。他运用法家的革新学说，紧密结合秦国的具体情况，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制定了一系列破旧立新的变法措施：奖励军功，废除世卿世禄制度，确立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普遍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坚决实行“法治”，进一步强化地主阶级专政；废井田，“开阡陌封疆”，重农抑商，招民垦荒，从法律上确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他借助革命暴力，摧毁了秦国奴隶制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新旧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中起了重大的进步作用。

列宁说：革命“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又说，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是“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论策略书》）在秦献公武装夺取政权的基础上，商鞅变法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打破了秦国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使秦国由一个奴隶制国家转变为一个封建制国家，这是商鞅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分封、等级、世袭的制度是奴隶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是奴隶主阶级层层统治和世世代代剥削广大奴隶的制度。商鞅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分封、等级和世袭特权，代之以新兴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正是当时新旧社会制度斗争的重大问题。商鞅规定，“国以功授官予爵”，（《商君书·靳令》）不以农战，则无官爵，沉重打击了那些“贵族卿士之家”和依附于他们的“游惰之民”，改变了奴隶主贵族把持政权的“君弱而臣强”的局面。同时，通过奖励军功“而显耕战之士”，使各级政权逐步转移到新兴地主阶级手中。后来，商鞅又在秦国普遍推行县制，剥



夺了奴隶主贵族的地方特权，废除了他们的私家武装，把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大权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

商鞅充分发挥新的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采取种种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消灭旧的经济基础，用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这是商鞅又一重大的历史功绩。

商鞅变法前，秦国奴隶制的井田制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地大而不垦”的情况，“有地方数千里”但粮食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尤其是，井田制的存在，保存了奴隶主贵族在土地上的世袭垄断特权，妨碍了封建国家的政治统一。商鞅颁布“开阡陌封疆”的法令，废除了井田制，承认地主、自由民土地私有制，这是生产关系方面的一次根本性的大变革，它摧毁了奴隶制度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地主经济在秦国的支配地位。在新的封建所有制下，社会仍然是建立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上，但剥削形式改变了，原来完全没有权利的奴隶，变成了“**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列宁：《论国家》）的农民，即已经不算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他们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了秦国“民众而兵弱，地大而力小”的落后面貌。

为了保证变法革新的顺利进行，商鞅坚决实行法治。他认为，法令是地主阶级的生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主张“刑无等级”，赏罚要“不失疏远，不违亲近”，彻底否定了奴隶社会“刑不上大夫”的制度，公开宣布对敢于违法的奴隶主贵族要实行坚决镇压。他在秦国公布了统一的法律，禁止奴隶主势力为非作歹，使他的变法事业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路线正确，后来居上。商鞅变法的正确路线，使秦国“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国以富强”，（《韩非子·和氏》）迅速由一个被诸侯看不起的奴隶制弱国，一跃而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封建制强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攻击商鞅的“法治”“包含着一系列反动的概念”，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咒骂法家是“罚家”，这不过是孔老二徒子徒孙的老调重弹。恩格斯说：“**没有暴力，没有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不会成功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商鞅坚决实行法治，充分发挥暴力的革命作用，对反对变法革新的反动势力采取坚定不移的无情手段，这正是他的事业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苏修、林彪咒骂革命的暴力，把进步说成反动，这正说明他们和历史上的没落奴隶主贵



族一样，都是人类社会的“奸”和“虱”，是倒行逆施的复辟党。

三

在商鞅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极其激烈的斗争。商鞅的一生就是与奴隶主反动势力顽强斗争中度过。

变法前，在秦孝公面前，商鞅与旧贵族政治代表甘龙、杜挚就“要不要变法”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论战。斗争的结果，商鞅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革新理论，击败了儒家鼓吹“法古”、“循礼”的陈词滥调，从思想理论上为变法扫清道路。变法刚开始，奴隶主贵族利用传统习惯势力，煽动成千成千人在首都闹事，“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妄图一举扼杀初试锋芒的变法运动。后来，他们又唆使太子犯法，公开挑衅，蓄意破坏变法路线的贯彻。面对着这种严重的政治形势，商鞅没有被反动保守势力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也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敏锐地抓住问题的症结，指出：“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史记·秦本纪》）决心狠狠打击那些破坏变法的顽固派。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劓刑），在公孙贾脸上刺字（黥刑），严惩了太子的两个师傅——真正的幕后策划者；还杀了犯法的奴隶主贵族祝懣；并把捕获的七百多个破坏变法革新的反革命分子全部在渭水边镇压了。商鞅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对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实行专政，对旧社会旧势力的垂死挣扎实行革命镇压，充分表现了商鞅作为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政治代表敢作敢为的战斗精神。

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纠集一小撮死党，继续策划反革命活动。一些本来“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的旧贵族改变策略，装作奉公守法的样子，挤出一副笑脸，竟娓娓动听地论起变法的好处来；而反动儒生赵良则是另一副面孔，在奴隶主贵族指使下，赤膊上阵，舔起儒家唾余，跑到商鞅跟前，歇斯底里地咆哮：“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指责商鞅变法不得人心，要商鞅弃政下台，隐退归田，否则就要来收拾他，反动气焰嚣张已极。阶级敌人软硬兼施，又是阿谀奉承，又是威胁讹诈。商鞅头脑清醒，坚持了法家路线，他痛斥那些“当面捧场、背后骂娘”的旧贵族是“乱化之民”，把他们



统统迁到边城去，摧垮这伙地头蛇的老巢；并断然拒绝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最后通牒”，以把变法事业进行到底的决心和行动，回敬了赵良这帮反革命侏儒。

然而，商鞅变法毕竟是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与旧贵族勾搭在一起的太子驷上台执政，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鬼蛇神纷纷从阴沟里爬了出来。公子虔们立即大肆造谣，诬告“商君欲反”，（《史记·商君列传》）秦惠文王（即太子驷）下令逮捕商鞅。公元前三三八年，反动派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这个杰出的法家战士。商鞅以身殉职，为新兴地主阶级革新事业献出了生命，结束了战斗的一生。

杀害商鞅，是奴隶主复辟势力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反攻倒算，是继孔丘杀少正卯，楚国旧贵族乱箭射死著名法家吴起之后，又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暴行。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没有调和的余地。苏修叛徒们宣扬儒法合流论，说什么儒法两派“追求同一目的”，这种拙劣的谎言，卑鄙的伎俩，既不能抹煞血迹斑斑的历史事实，也丝毫无助于掩盖他们自己今天对革命力量的法西斯暴行。

商鞅被害后，秦惠文王推行了一条排斥法家、信用旧贵族的政治路线，秦国的政局出现了暂时的反复，这说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列宁：《当前的主要任务》）然而，“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韩非子·定法》）商鞅被害，“秦法未败”，商鞅的路线和事业并没有被消灭。这一点，值得分析和研究。

列宁说：“革命愈深入，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即使发生复辟，保留的成果也会愈多。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商鞅在变法期间，从开阡陌封疆、奖励耕战到废除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制度，从建立县制、加强中央集权到“燔诗书而明法令”，总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深深地掘了旧地基，给奴隶主阶级以强有力的打击，使新兴地主阶级成为左右秦国政治的强大力量，使商鞅之法的继续推行有了一个牢固的阶级基础。同时，商鞅在变法过程中，比较注意宣传，他认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使“万民皆知所避就”，（《商君书·定分》）因而使得“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战国策·秦策一》）人民群众从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变法革新的好处，就成为抵制和反对旧制度复辟的巨大物质力量。



总之，秦法之所以未败，根本的原因在于，商鞅之法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复辟势力只能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倒转历史的巨轮，决不能改变封建制度必然要代替奴隶制度的历史规律。

商君身死法未败，秦皇终奏统一功。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秦国还是继续沿着商鞅变法的法家路线前进。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乃至采取焚书坑儒的坚决镇反措施等等，都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的基础上，成功地实行和发展了商鞅等人的法家路线。沿着这条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路线前进，秦始皇为祖国统一、历史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封建社会的“千古一帝”。

对于商鞅这样一位在历史变革激流中斗争一生的人物，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褒少贬多，但却泾渭分明。历史上那些主张革新的进步人们，大都肯定商鞅的历史功绩。战国末年的韩非在自己的出色著作中，记述了商鞅的英勇业绩，发展了商鞅的先进思想，成为法家理论集大成者。西汉著名法家桑弘羊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了商鞅的学说，他针对儒家贤良文学攻击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的谬论，指出商鞅“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功如丘山，名传后世”。（桓宽：《盐铁论·非鞅》）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顽固党对商鞅一片咒骂声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写出了“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的战斗诗篇，《商鞅》并在变法实践中，贯彻商鞅的理论。与此相反，历史上那些守旧、复古派则从反动的政治需要出发，往往大骂商鞅变法。西汉的“孔老二”——董仲舒就恶毒攻击说，秦国“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造成了祸国殃民的结果。（《汉书·食货志上》）宋代保守派苏轼，攻击商鞅变法使老百姓“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亡”，借此发泄对王安石革新事业的刻骨仇恨。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伙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手中没有真理，只得捡起这些儒家肮脏武器，妄图借攻击商鞅，来诋毁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看，这批马列主义的叛徒，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儒家的对立面法家，正确评价和阐述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和尊儒反法思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注意解决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武鸣县委员会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我县深入开展。我们充分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纲领，同时紧密联系本县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帮助县委提高路线觉悟，进一步把路线搞对头，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落实，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全县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

通过批林批孔，解决县委“一班人”如何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开始我们并不是很自觉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逐步认识到运动的重点要放在领导机关，而就一个县来说，关键在于把县委的路线搞对头。如果不把路线搞对头，县委“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回顾一下我们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我们县罗波公社有个凤林大队，原来是全县比较后进的大队。为了改变这个大队的面貌，县和公社曾先后两次派人去蹲点。但由于没有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抓好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所以落后面貌一直没有改变。后来，县委一位领导同志带领机关干部，第三次到这个大队蹲点。他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对群众和干部进行了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打击了进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批评了资本主义倾向，从此这个大队的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粮食产量大幅度上升，多种经营也有了发展，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县委领导是不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全县工作的好坏关系极大。因此，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注意解决县委“一班人”的路线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要搞好批林批孔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解决县委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县委常委内部开展了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依靠群众来解决领导机关的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基本经验。忘记了这条基本经验，就会重犯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领导很不得力，甚至压制群众的错误。充分发动群众，坚决依靠群众，才能正确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对错误路线的识别能力，坚定纠正错误的决心和信心，把县委的路线搞对头。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字当头，和群众一起，并肩战斗，向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即使犯有某些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会得到群众的谅解。县委“一班人”提高了认识，积极地投入了运动，认真学，深入批。同时，还采取召开常委扩大会、各种类型座谈会和走出去征求意见等方法，发动广大群众和机关干部，紧密联系实际，揭露和分析县委在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

经过广泛深入的发动，群众和干部用大字报、会议发言和来信来访等形式，向县委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批评意见。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县委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方面，有抓一阵松一阵的现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生事物，支持不够有力；在农业学大寨问题上，两种思想的斗争还没有很好解决。对于群众提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通过深入批林批孔，不断提高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加以改正。

我们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抓一阵松一阵，不能坚持抓下去，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认识不足。抓了一阵，取得一些成绩，就认为“差不多了”，“可以管一阵子了”，因而就放松下来，忘记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领导成员走出去，同广大工农群众和机关干部一起，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进行深入的批判。通过批判，大家进一步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大家说，林彪一伙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同他们针锋相对，坚决斗争。思想提高了，行动就自觉了。前段春耕大忙，又遇到严重春旱，怎么办？大家一致意见：要抓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抓批林批孔，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搞好春耕生产。我们十一名常委，除两名留在机关照顾日常工作外，都带领机关干部下到基层，发动群众批林批孔，大干苦干。县委一位负责同志同一些机关干部到陆幹大队，发现这里春耕进度慢，经过调查，原来是阶级敌人利用孔孟之道在进行破坏。他们胡说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妄图用“天命论”来涣散人们抗旱抢插的斗志。根据这个情况，县里去的同志帮助大队党支部放手发动群众，批判了林彪、孔老二的“天命论”，并联系这个大队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批斗了有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了抗旱抢插的进度。县委及时召开现场会，总结推广了这个大队抓批林批孔、促抗旱抢插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和生产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当它们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还是热情支持的。近一两年来，对有些工作却没有认真过问，致使有的新生事物不能很好地巩固和发展。通过批林批孔，在广大群众的严肃批评和热情帮助下，我们提高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林彪反党集团拚命攻击、诬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对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积极扶植还是漠不关心，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认识提高了，便立即采取措施，积极扶植新生事物的成长。我们先后组织了有一百六十多名医务人员参加的宣传队，分期分批深入到问题较多的大队，对合作医疗进行了整顿，并总结推广了一些先进大队坚持办好合作医疗的经验。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全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建立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一新生事物，我们也有重视不够的问题。在运动中，我们召开工人、贫下中农



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并采取措施，充实加强了驻校宣传队。我们还组织革命师生到先进的学校参观学习，推广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和进行教育革命的经验。这样，全县教育革命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些地方贫下中农组织起自己的理论队伍，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使批林批孔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我们认为，这是批林批孔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应该大力支持，于是总结推广了这方面的经验，有计划有步骤地办起了批林批孔学习班。县委已先后培训工人、贫下中农理论骨干五百多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林彪一伙恶毒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激起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义愤。大家用我们县农业学大寨取得的成绩，对林彪一伙的无耻谰言给以有力的回击。通过批林批孔，广大群众和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大好形势。这就要求我们县委克服保守思想，以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对农业学大寨的领导。我们有的同志原来认为，经过几年的努力，保水田不少了，粮食产量不低了，对国家贡献不小了，群众生活不错了，因而不想大干苦干了。很显然，这种思想，不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要求，不适应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也违背广大群众和干部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只有坚决克服这种思想，才能带领群众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经过反复学习讨论，并深入批判林彪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县委领导成员统一了思想，振奋了革命精神，决心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除了抓好当前生产以外，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全县的水利条件，我们通过实地勘察，通盘考虑，作出了修建乔响引水工程的全面规划，这项工程完成后，可扩大灌溉面积六万多亩，现已开始动工。与此同时，我们还抓了现有水利设施的配套成龙，组织专业队常年施工，对四个水利灌区的三百多公里干渠进行整修，堵渗防漏，加快流速，提高灌溉效能。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批林批孔运动的革命洪流，正在推动着社会主义事业大步前进。我们决心沿着毛主席、党中央指引的航向，继续把全县的批林批孔运动引向深入，进一步把县委的路线搞对头，团结全县各族人民，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更大胜利。



在斗争中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

山西浑源县刁窝大队党支部

我们大队，是个二百六十多户的偏僻山村。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根据斗争的需要和贫下中农的要求，逐步建立和培养了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理论队伍。

对于建立贫下中农理论队伍的重大意义，我们是在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的。

批林批孔开始后，全队的干部和群众怀着极大的革命义愤，向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思想猛烈开火，积极投入了战斗。但是，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也遇到了不少困难。有一些群众文化水平低，对林彪孔老二的黑话弄不懂，对他们的反动谬论往往批不到要害处。同时，孔孟之道的流毒在我们大队也还存在。什么“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的封建说教，什么“和人一条路，惹人一堵墙”的“中庸之道”，什么“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命里二合半，累死也扯淡”的“天命论”等等，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要把运动引向深入，就必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抓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抓住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从政治上和思想理论上批深批透。

运动中，我们还总结了本大队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批判了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修正主义路线，刹住了资本主义妖风，生产大发展，粮食产量翻一番。可是，由于我们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认识不清，抵制不力，前几年又出现过一些资本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深思：为什么对错误路线识别不了呢？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东西又有反复呢？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执行毛主席革



命路线的自觉性。

通过分析运动的形势和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要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要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必须建立贫下中农自己的理论队伍，“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把贫下中农这支农村批林批孔的主力军，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这是在农村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

认识提高以后，我们立即着手建立和培养理论队伍的工作。今年二月，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挑选了十二名路线觉悟高、表现好、联系群众的积极分子，由党支部书记挂帅，建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理论组。其中有老贫农，有知识青年，有妇女。我们注意团结革命的知识分子，把学校教师中的积极分子也吸收到理论组。随着运动的深入，陆续吸收批林批孔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使理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现在已经发展到三十人。

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是批林批孔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产生，和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必然伴随着一场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理论组刚成立，阶级敌人就攻击说：“泥腿子要能学理论，除非老牛能上树。”组里有的同志也认为理论很高深，有点望而生畏，觉得大老粗啃书本，握笔杆，是高不可攀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组织理论组的同志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分析农村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大家体会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激烈斗争。要使农村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的阵地，贫下中农就必须努力坚持学习，“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还组织大家回忆旧社会地主富农垄断上层建筑领域，全村没有一个贫下中农读过书的历史事实，狠批了孔老二宣扬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反动谬论。大家认识到，阶级敌人在旧社会剥夺贫下中农读书认字的权利，就是要使劳动人民乖乖地给他们做奴隶；现在他们又攻击贫下中农学理论，就是企图阻止贫下中农掌握革命的思想武器，以便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大家坚定了学好革命理论的信心，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掀起了学习高潮。一位六十岁的老贫农，参加理论组的时候，不识一字，但他知难而进，不能读书



找人念，不认识字请人教，经常坚持到深夜，努力攻克文化关，攀登理论山。几个月来，理论组先后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实践论》、《矛盾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

贫下中农理论队伍，在斗争中产生，也必须在斗争中培养提高。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培养理论队伍，也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开始时，有的同志以为理论组就是学理论，坐在家里读书写文章。结果，他们写出的文章，往往脱离实际。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帮助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把他们放到斗争的第一线，和社员一起劳动，一起学习，一起批林批孔，让他们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在批“克己复礼”时，为了更好地结合当地的阶级斗争实际，理论组调查了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咒骂我们民主政府是“坏人当道”；日寇投降后，地主还乡团攻击我们的革命政权是“暴政”；现在，地、富、反、坏、右又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整得他们“活不下去”。为什么阶级敌人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呢？围绕这个问题，理论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识到：国家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是劳动人民的护身法宝，阶级敌人攻击它，就是为了复辟。林彪一伙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独裁”、“绞肉机”，就是妄图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通过调查、学习、批判，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使理论组的同志经受了锻炼，增强了斗志，增长了才干，更加朝气蓬勃。党支部副书记，过去有“让人一步自己宽”的思想。参加理论组学习以后，批判了“中庸之道”，领导群众对破坏春播生产的阶级敌人，进行了有力的斗争。

培养贫下中农理论队伍，要注意解决他们学习和劳动中的实际问题。我们根据业余理论队伍是在坚持集体生产劳动的业余时间活动的特点，既给他们创造一定的条件，让他们多读一点书，又教育他们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我们帮助他们制定了必要的学习制度和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农闲多学，农忙挤时间学，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读物，还请下乡干部和学校教



师给他们作理论辅导和上文化课。他们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先当学生，后当先生，一方面给群众作辅导，一方面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理论组内部，注意发挥老、中、青三结合的优点，让青年人向老贫农学习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老贫农向青年人学文化，互帮互学，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我们大队的理论队伍建立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已经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显示了这一革命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在理论组的带动下，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越来越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自觉，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理论组的成员，经常向社员群众宣传看书学习的重要性。他们深入到政治夜校、田间地头、家庭院落，组织和帮助群众认真读书。经过学习，群众尝到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甜头。他们说：“学好理论真管用，事情根由分得清。”大家普遍感到学习理论之后，站得高了，看得远了。

理论组的活动，有力地促进了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他们带头发言，带头批判，是批林批孔的先锋和骨干。党支部经常和他们一起分析运动的形势，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和理论辅导工作。运动开始，他们写了《孔丘是什么人，林彪是什么人，批林和批孔是什么关系》的辅导材料，帮助群众提高了对批林批孔重大意义的认识。随着运动的深入，他们针对林彪、孔老二的谬论，帮助群众选学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语录，掌握批林批孔的思想武器。为了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们深入到贫下中农中进行阶级调查，写出了九份家史和村史，还帮助一百八十多户贫下中农召开了家庭批判会。针对在联系实际问题上出现的不敢联和纠缠具体问题的倾向，党支部和他们一起分析了本大队现实阶级斗争的表现，引导群众联系实际，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进一步提高了大家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随着干部、社员精神面貌的变化，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到处都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培养积极分子 深入批林批孔

青海共和县蒙古大队党支部

我们蒙古大队，有四个生产队，一百四十一户社员，多数是蒙古族，少数是藏族、土族、回族和汉族，通用藏语。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后，广大群众和干部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积极投入战斗。广大贫苦牧民在旧社会深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苦大仇深，对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极端仇恨，很快就形成了批林的高潮。但是，由于许多人不知道有个孔老二，不知道孔孟之道是些啥，加上对一些古人、古事很生疏，所以，批孔比起批林来，困难更大些。

知难而进，还是见难而退？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在困难面前，我们大队党支部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规定的有关批林批孔的文件，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孔派。孔孟之道是他们开倒车、搞复辟的思想武器。要批判修正主义，就必须同孔孟之道作斗争。不批孔，就不可能深入批林，就不可能彻底战胜修正主义。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贫下中牧主力军的作用，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去实践，在前进中克服困难，积累经验。

毛主席说：“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我们感到批林批孔如果没有足够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本民族的骨干队伍，要克服困难，取得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也是不可



能的。运动一开始，我们就举办学习班，培训了六十多名积极分子作为骨干。随着运动的发展，不断壮大了积极分子队伍，现在骨干人数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批骨干分子有较高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学过一些汉文、藏文，但都学得不大通。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在组织学习时，首先把印有汉、藏两种文字的批林批孔文件和材料，一句一句地对照，使他们弄懂弄通。我们还针对林彪的谬论和孔孟之道，选了七十多条毛主席语录，译成藏文，组织他们学习，掌握批林批孔的武器。党支部副书记尼玛，只读过四年书，开始接触到儒法斗争的历史时，弄不清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和“焚书坑儒”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就坐下来，硬着头皮读了一点历史，懂得了“焚书”就是秦始皇下令烧毁了散布孔孟之道的书，“坑儒”就是活埋了四百六十个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儒生。接着他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教导，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历史事实，认识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次反复辟、反倒退的革命行动。林彪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其目的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样就更加看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他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成发言稿，在大小队会上对林彪和孔老二进行了有力的批判。通过刻苦学习，深入钻研，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提高了思想和理论水平，成了批林批孔的闯将，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支理论辅导队伍。这些积极分子对中央文件精神接受较快，理解较深。他们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熟悉本民族的情况。在他们的广泛宣传和积极带动下，全大队的批林批孔运动就迅速地开展起来了。

在实践中我们体会到，用本民族通俗的语言和群众熟悉的事例讲解文件，就能使群众了解孔孟之道的反动观点，开展批判。在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时，群众对“克己复礼”这个词感到生疏难懂，有的人甚至按“克己复礼”的藏语译音作了错误的理解。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先把孔老二所以要坚持“克己复礼”的原意向群众讲清楚。然后，联系本地区解放前的反动统治制度，来说明“周礼”的内容。解放前，王公、千百户各霸一



片草原，分割统治劳动牧民。统治阶级内部又分成千户、百户等几个不同的等级。王公、千百户死了，就由长子继承统治权。他们世代代骑在贫苦牧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些，就和“周礼”中的分封、等级、世袭等制度相类似。这样一讲解，使群众了解了“周礼”的阶级内容及其反动实质，认识到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恢复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林彪扛起孔老二“克己复礼”这面破旗，要学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就是要“兴”被我们推翻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牧区“继”王公、千百户的反动统治的绝世，“举”反动的牧主头人，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广大群众抓住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实质，批判击中了要害。贫苦女牧民兰措说得好：“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牧主头人想变天，原来他们念的是一本复辟经，走的是一条回头路，都是披着羊皮的豺狼。”大家从这里认识到，孔老二的那一套，尽是一些替奴隶主贵族讲话的“吃人”道理，虽然孔老二讲的古话不好懂，但是，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一定能够戳穿孔老二这只纸老虎，把他批倒批臭。

毛主席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根据这个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观点，我们觉得，联系广大贫苦牧民的切身体验，是深入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我们这个地方，反动统治阶级散布了许多反动思想，广大贫苦牧民是深受其害的。这些反动思想，有的是和孔老二的谬论息息相通的，有的甚至是从孔老二那里搬来的。长期以来，“天命论”是束缚贫苦牧民的精神枷锁。反动牧主头人曾经大肆宣扬“长相好坏父母生，命运好坏前世定”，“幸福灾难在老天，平安苦痛在佛爷”等谬论，用以麻痹和愚弄群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贫苦牧民联系自己的切身体验，对“天命论”进行了批判。贫苦牧民丹增，在旧社会当了二十年“塔哇”（寺院的苦工），活佛曾经对他说：“我们心灵，前世就知道念经，有命当佛爷；你们愚笨，你们的命就是背水、倒灰、喂牲口，当‘加麻’（做饭的）。”可是解放后，还是这个丹增，却翻身做了主人。他的老伴在旧社会被牧主骂作只能当奴隶的“笨



人”，现在当上了大队的妇女干部。丹增说：“这些难道都是因为命吗？不是的。活佛的鬼话和孔老二讲的完全一样，都是用来骗人的。旧社会我们受苦受难，是由剥削制度造成的。我们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有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来就没有什么天命。林彪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就是反对我们革命，妄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决不能上他的当。”在批判孔老二“仁者爱人”的反动谬论时，广大群众通过回忆在旧社会的苦难遭遇，深刻地揭露了“仁爱”的吃人本质。他们说，反动牧主头人嘴里讲着什么“仁”、“爱”，象蜜糖一样甜，干的事却象豺狼一样狠毒。林彪也鼓吹什么“仁爱之心”，但背地里却要搞反革命政变。所谓“仁爱”，就是给狼身上披上羊皮，给刽子手献上哈达。“仁爱”是假的，吃人肉，喝人血才是真的。大家表示，一定要分清狼和羊，对阶级敌人决不能施“仁政”，而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践证明，把孔孟之道和少数民族地区反动统治阶级的罪行联系起来，并联系自己深受其害的切身经历，广大群众就能深刻认识孔孟之道的反动实质，就能批得深，批得透。

在斗争中，我们体会到，广大贫下中牧有鲜明的阶级立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克服困难深入批林批孔的有利条件。关键是要加强领导，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我们每组织一次大批判，都要先开骨干会，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讲一点历史知识，并联系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把要批判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搞清楚；同时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让他们带头批判。这样做的结果，充分发挥了贫下中牧的主力军作用，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使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地向前发展。

根据社员居住分散、流动性大的特点，我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组织群众开展批判。一般说，多开小会，少开大会，妇女老人和儿童白天开会批判，放牧员晚上集中批判。居住特别分散不便集中的，由骨干去进行个别辅导，组织他们开帐房批判会，家庭批判会，联户批判会，使他们都能够参加批林批孔，受到反修防修的教育。现在，全大队处处摆战场，男女老少齐上阵，在辽阔的草原上，批林批孔的烈火越烧越旺。



从“天马”看林彪野心家的世界观

靳 南

在林彪床头正中墙上，挂着一张他自己手书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反动条幅。林彪自比“天马”，梦想“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庄子·在宥篇》），充分暴露了他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世界观。

“天马”，本来也指的是一种吃草而供人们使役的马，只不过是比较好一点的马而已。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武帝时，先是把得到的乌孙马叫“天马”，后来又得到大宛的汗血马，比乌孙的马更好，所以“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许多人作歌咏赋，把这种马吹得神乎其神，竟说成是上帝赐给人间的神物。一些帝王将相和所谓贤人智士，往往以“天马”自喻，借以标榜自己才能出众，生就不凡，是“受命于天”的。他们身在人间不愿作人，偏要当马，岂非怪事？原来，神化“天马”，正是为了神化自己。自比“天马”，不是要象汗血马那样，叫人去骑，或者拉车干活，而是要“独往独来”，横行天下，称王称霸。

《汉书·礼乐志》载有两首《天马》歌，集中地描绘了“天马”的形象。难得封建文人雕文吐字的功夫，虽然说的是马，但人们从这里却可以看到自比“天马”的林彪的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嘴脸。

“天马”欲望无边，思想和行动不受任何约束（“志倣傥”），它能够脚踩浮云（“籥浮云”），腾空而飞（“晡上驰”），转瞬万里（“逝万里”），奋摇高举，谁也不能与之相比（“将摇举，谁与期”）。（均见《汉书·礼乐志》）后人常以“天马”来歌颂人，也无非是说他如何与众不同，超凡入圣。李商隐称赞别人策划军机是“手为天马，心绘国图”（《为举人上翰林肖侍郎启》），即手指所向，便可“奇功”而“就”。陆游的《悲歌行》中也说“士如天马龙为友，云梦胸中吞八九”。实际上，“天马”的形象，活现了一副纵心所欲，横行霸道，翻云覆雨，独步天下的野心家的脸谱。林彪自比“天马”，正好说明他是这样一个妄图扭转乾坤、让历史车轮倒转的野心家。他妄图“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以达其篡权复辟的目的。他纠集一伙死党，精心炮制《“571工程”纪要》，并且密书“手令”，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颠覆无产阶级



专政。这正是他“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反革命野心的极端表现。但是，无视无产阶级专政强大力量的人，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林彪以“天马”自居，妄图“独往独来”，以为依靠少数人搞阴谋活动就可以决定一切，这种反动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反革命活动只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天马》歌中说：“太一况，天马下”。“天马”为“太一”尊神所赐，象征着人间的帝王。“天马”和“独往独来”连在一起，这就如同庄周所说，是“至贵”的“独有之人”，可以“独治天下百姓”。（《庄子·在宥篇》）“天马”既是天生神物，就能够“游阊阖，观玉台”（《汉书·礼乐志》）。“阊阖”本指天门，“玉台”本指上帝居住的地方。后人把“阊阖”引伸为王府的宫门。唐代王维诗“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描绘的就是大开宫门，各国使臣向皇帝朝拜。林彪这样醉心于“天马”，说明他日夜所做的是皇帝梦。他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以当代的周文、齐桓自居；另一方面，又视人民为鸟兽，只能任他宰割。过去的帝王崇信“凤独立”、“鸾无群”的孤家寡人哲学，林彪也正是这样一个唯我独尊、“独往独来”的恶棍。他效法孔老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之道，疯狂破坏和镇压革命群众运动，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但是，妄图高踞于群众之上，做统治人民的“独夫”的人，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林彪坚决与党和人民为敌，最后只能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天马”又是一个十足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化身。它会玩弄各种骗局（“精权奇”），身披两色皮（“虎脊两”），变化如鬼神（“化若鬼”）。（《汉书·礼乐志》）凡是野心家，无不玩弄阴谋诡计，随机应变，掩饰自己，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毛主席揭露和批判一切野心家、阴谋家总是“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长期以来，林彪千方百计地施展“天马”的惯技，把“面带三分笑”、“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骗子哲学，作为处世的诀窍。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英国状况》）。林彪的勃勃野心，注定了他必然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林彪之所以要这样做，正象毛主席说的那样：“因为他们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彻底灭亡的命运。

神化“天马”，自比“天马”，鼓吹“独往独来”，是历史上反动没落阶级唯心主义、唯我主义腐朽世界观的表现。他们由于手中没有真理，政治上极端虚弱，总是要靠自吹自擂过活。孔老二自吹“天生德于予”；孟轲自命“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庄周狂呼“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陆象山扬言“吾心即是宇宙”，如此等等，真好象没有他们这些人，地球就不转了。林彪这匹“天马”的反动世界观，所以同这些人的反动思想息息相通，因为他们都是腐朽没落阶级的代表。

在我们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死不悔改的“独往独来”者。陈独秀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仇视革命群众运动，大骂中国工人阶级“幼稚”，诬蔑农民运动“过火”，搞右倾机会主义的“独往独来”，向蒋介石反动派打出白旗，结果堕落成反动的托洛茨基派。王明自称“百分之百”正确，以太上皇自居，对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中国革命实际，先是“左”得出奇，后又右得要命，直至投靠苏修，堕落成为叛徒、卖国贼，最近又一命呜呼，独往而无来。张国焘分裂红军、分裂党，另立中央，最后成了孤家寡人，只身逃跑，到国民党那里当了特务。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匹“天马”虽然是“行”了“空”，但却自我爆炸，葬身荒漠的一抔黄土之中，同样是独往而无来了。历史雄辩地证明：“我们的敌人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不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他们的阶级本能引导他们老是在想：他们自己怎样了不起，而革命势力总是不行的。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绝妙的是，在中国，螳螂亦称“天马”，林彪这个“独往独来”的“天马”，实际只不过是螳螂，怎能不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得粉碎！

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完全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坚持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坚决反对林彪“独往独来”的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的建设的指导原则，也是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搞“独往独来”的锐利武器。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批林批孔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进行到底。



尊孔是为了复辟和倒退

河北献县南河头大队党支部书记 张本林

我们村东北有个汉王坟，方圆六七十亩大。这个汉王就是汉武帝刘彻的哥哥刘德。他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尊孔派。秦始皇下令烧了孔孟的书，他对这件事恨之入骨，下决心“传经翼圣”，把传播孔孟之道作为自己的终生大事。他被封为河间王以后，就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民间大肆搜罗孔孟的残书，有的出高价收买，又修又补，有的一字一句地抄下来。最后，他把孔孟的这些破烂儿整理出来，献给了汉武帝。这个人死后被封为“献王”，因为他献过书，人们叫他“献书王”。献县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

刘德搜书、献书，是对秦始皇烧书的反扑。他为接续孔孟之道效了犬马之劳。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地主老财捧他为“千古贤王”，庙越修越大，坟越堆越高。他们一面大骂秦始皇烧书犯了弥天大罪，一面大捧刘德献书使孔孟之道绝处逢生，象一盏明灯照亮了天下。

反动统治者和地主老财为什么对刘德这个家伙那样亲？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翻了他的老底，剥掉了他的画皮，不但看清了刘德这个“献书王”的真面目，也进一步认清了林彪鼓吹孔孟之道，推行“克己复礼”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汉武帝的时候，儒法斗争是很激烈的。汉武帝虽然表面尊儒，心里是不信儒的。刘德为什么要向汉武帝“献书”？说穿了，就是因为他嫌汉武帝执行了削弱诸侯王国，巩固国家统一的法家路线，妄想用孔孟的儒家路线去代替它。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



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刘德这个奴隶主残余势力的代表，散布反动的孔孟之道，就是为向新兴地主阶级夺权制造舆论的。他叫嚷什么不学孔孟之道，就象离开了太阳，黑灯瞎火地辨不清方向。“献书”就是他向汉武帝夺权的一次试探，是一场革新与复旧，前进与倒退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他献书时，向汉武帝大讲了一通倒退、复古的谬论，明里暗里攻击当时推行的法家路线。汉武帝一听很恼火，就连讽带刺地说：汤靠七十里得天下，文王靠百里得天下，你要努力啊。刘德一见自己的诡计被识破，几十年的心血落了空，就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慌里慌张地跑走了。他回来以后，整天心惊胆战，揣着酒杯过日子，第二年春天，就见孔老二去了。

一切反动派搞复辟，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改变路线。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朝思暮想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就是为了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和孔老二、刘德打的是一面黑旗，唱的是一个调，走的是一条道。林彪把孔孟之道当作宝贝，编什么《四书集句》，把孔孟的黑话贴满了他的黑窝，又抄又背，妄图用孔孟之道作为他复辟倒退的思想武器。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的阴谋败露以后，仓皇逃命，一头栽到蒙古的温都尔汗沙漠里。林彪虽然与孔老二、刘德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的下场是多么相仿啊！

刘德这个尊孔派，吹捧儒家、反对法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给对方抹黑，给自己搽粉，骂法家“残忍”，吹儒家“仁慈”。刘德声言，只要实行了孔老二的“仁”，天下就能永远太平；只要用孔老二的“德治”，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他还假惺惺地贩卖什么，天下有一个人挨饿，就等于我挨饿，有一个人受寒，就等于我受寒。好象他最关心老百姓。实际上他玩的还是孔老二的一套，用所谓“仁政”、“德治”，来攻击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林彪和刘德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他也把孔老二的“仁政”搬了出来，大骂法家是“罚家”，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是“暴政”，是“绞肉机”。他的黑心就是妄想要我们对那些过去骑在劳动人



民头上的黄世仁、南霸天施“仁政”，对他们“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很清楚，林彪的“仁政”，就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林家王朝的法西斯专政。

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的“仁政”是什么？我们贫下中农最清楚。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吃尽了地主资产阶级“仁政”的苦啊！那时的南河头，又叫“难和愁”。村里大部分人都是被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拉着讨饭棍，逃荒到这里来的“叫花子”。那会儿有这样一首民谣：“长工日子苦难言，地主鞭子身上缠，年轻给人当牛马，老来孤身去讨饭。”这就是孔孟之道的“仁政”、地主资产阶级的“仁政”！我十一岁就给地主当放羊娃，吃糠咽菜、挨打受骂，饱尝了这种“仁政”的滋味。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我们贫下中农才当家做了主人，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九五一年，我们九户佃农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合作社，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去年，我们大队的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一千二百多斤。如今，家家住新房，户户有余粮。旧社会的“难和愁”，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幸福庄”。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深深感到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的命根子。

一切反动阶级，本来都是对穷人不吸完骨髓、榨干油，就不撒嘴的毒蛇，但他们总是把“仁政”喊破了嗓子、叫破了街，假装他们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这种现象，告诉我们一条阶级斗争规律：所有搞反革命活动的反动派，都是打着“仁政”的招牌，用“仁政”、“德治”一类的瞎话来掩盖他们吃人的本质。这是因为他们只代表一小撮剥削阶级的私利，没有半点真理，所以他们总是玩弄老虎捻佛珠的把戏，摆出一副伪善的面孔。我们决不受他们的欺骗！

从孔老二到刘德，从刘德到林彪，上下几千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阶级斗争。事实证明，凡是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算上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反法的。他们尊来尊去，都是为了倒退，愚弄老百姓；反来反去，又都是为了阻挡社会往前走，镇压老百姓。在批林批孔中，我们仔细掂量了这里头的道理，认



识到，批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孔孟之道经过历代反动阶级的加工改制，成了一种反动剥削阶级的统治思想，它的那一套“向后退”的反革命理论，一切反动派都可以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拿来应用。所以，要前进，就得割断孔孟之道这个“绊马索”。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尊孔与反孔、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取得的。就拿我们大队来说，一九五一年，我们办社拔穷根，阶级敌人就出来“挡横”，宣扬孔老二的“天命论”，诬蔑我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妄图进行破坏。我们九户佃农硬是不信“天命”信革命，把合作社办了起来，当年就获得了丰收。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打着关心人民生活的旗号，强制推行复辟倒退的修正主义路线，硬让分田到户，牲口分户喂养，阴谋把我们拉到资本主义的路上，又被我们顶回去了。文化大革命中，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煽动下，有的同志迷失了方向，私自主持分了集体的一部分储备粮。对这种现象要不要进行斗争？有人又拿出孔孟之道，说什么“人和为贵”，“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要叫人想，不要叫人骂”，等等。我们认为这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大事，坚决按照毛主席关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的教导，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大辩论，打击了阶级敌人，批判了资本主义思想，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分清了路线，纠正了错误，增强了团结。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实教育了我们，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孔孟之道就必然会冒出来。要革命，就得批孔。毛主席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这就决定了批孔斗争也必然是长期的。不能指望孔老二的毒菌，打扫一次、两次就干净了。我们体会到，对孔孟之道，批判一次，头脑就清醒一点，觉悟就提高一步；但一放松警惕，又会还魂。因此，必须经常批，深入批，反复斗，斗到底！



团结起来 争取更大的胜利

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大团结

庄 宁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在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亿万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不断巩固和发展，这是我们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依靠这个力量，我们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摧毁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历史经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国家要统一，人民要团结，这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的土地上，共同生活和斗争，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开拓了辽阔的疆土，创造了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早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实行法家路线，废分封，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粉碎了奴隶主的复辟活动，结束了七国并立、诸侯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二千多年来，腐朽没落的反动阶级，尽管疯狂地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制造割据和分裂，但是由于国家的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统一的局面仍然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的一百多年里，我国出现了分裂混乱状态，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买办阶级的投降卖国所造成的。很多先进的中国人，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不惜流血牺牲，前赴后继，艰苦奋斗，但是都失败了。我国亿万人民群众团结统一共同愿望，只是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



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夺取了政权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省，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腐朽势力所阻碍不了的。

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大团结，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别于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显著的标志。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小撮阶级敌人所进行的群众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而且也能够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来同敌人作斗争。无产阶级团结的人越多，力量就越大，无产阶级专政就越巩固，社会主义事业就越兴旺，就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所以，毛主席经常不断地教育我们要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维护和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把“**要团结，不要分裂**”作为我们必须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之一。

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整个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危害和破坏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阶级根源。国内外阶级敌人，出于他们的反革命需要，处心积虑地要破坏我们的团结，分裂我们的队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也总是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妄图分裂我们的党，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这样干的。他打着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竭力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大搞分裂、复辟活动，妄图使我国倒退到“**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社会去。但是，林彪搞分裂、搞复辟的罪恶活动是违背党心、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团结的力量，**证明了**我国人民团结的力量。通过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革命罪行，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必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提高全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增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团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好革命团结，也要依靠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才有革命团结的方向，才有革命团结的基础，才能真正搞好革命的团结。所以，讲团结，就要讲路线。我们讲的团结，也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团结。各级党的组织，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要自觉地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好党的团



结，搞好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革命团结搞得好不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做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只有严格区分了敌我，才能团结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孤立、打击真正的敌人。只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使自己的同志和朋友，在革命的原则基础上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往往不容易一下子区别清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严肃地按照党的路线、政策办事，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不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以感情代替政策。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决相信，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干部是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只是一小撮，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是可以团结、也一定能够团结起来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去做好工作。看不到存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思想上右倾麻痹，把敌人当朋友，这是错误的；把敌我矛盾扩大化，以至把某些人民内部矛盾也看作敌我矛盾，也是错误的。历史经验表明，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必须注意吸取这个历史经验。在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当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为了使运动继续前进，就要更加注意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达到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而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爱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要挫伤这种积极性。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认真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团结一切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而且要团结那些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这样，就可以把绝大多数的人团结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我们一定要采取毛主席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和斗争是对立的统一。革命的团结是要通过斗争来实现的。正确地开展批评或者斗争，是实现团结必不可少的条件。特别是放手发动群众对问题和错误进行揭发批判，以弄清问题，分清是非，都是完全必要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地去揭露，去分析，去解决，“**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才能



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证明了团结——批评——团结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方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继续坚持这样办。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对于群众联系本地区本单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要热情欢迎，正确对待。凡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要从群众的揭发批判中，吸取经验教训，焕发继续革命的朝气，勇于承认错误，同错误划清界限，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同群众一起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斗争中，经受锻炼，将功补过。这样，就能同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为革命作出新贡献。

坚持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注意清除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不利于团结的错误思想言行，这对于增强革命团结，是非常重要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有的人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是以维护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增强人民的团结为出发点，而是为小派别、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而纠缠不休，离开了批林批孔的大方向。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对革命团结只能起破坏作用，同社会主义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团结统一的愿望，也是背道而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革命的大联合，革命大团结，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切革命同志都要牢记这个经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革命团结的促进派。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胸怀革命全局，放眼共产主义大目标，焕发革命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巩固和发展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多作贡献。切不可为小派别、小团体或个人的私利遮住了自己的眼睛，以致上了阶级敌人分裂革命队伍、转移斗争大方向、破坏革命和生产、破坏批林批孔运动的当。

毛主席号召我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当前全国形势很好，广大群众积极地投入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我们一定要继续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加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

柳 彤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农村商业部门在支援农业，支援工业，支援出口，保障社员生活需要，促进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对农村商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继续重视农村商业，切实加强领导，进一步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农村商业是整个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同农民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的一个纽带。我国广大的社会主义农村，是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毛主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目前，我国城市和工矿区所需要的粮食、副食品和轻工业原料，出口物资中的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全部或大部分要经过农村商业部门从几百万个生产队收购上来；销往农村的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资料，全部或大部分要经过农村商业部门供应到亿万农民的手里。做好农村商业工作，正确发挥商业部门联结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的桥梁作用，就可以扩大工农业产品交换，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加强我国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进一步密切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农村商业又是农村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农业生产关系密切。农村商业部门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正确的经营方针，认真落实现阶段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努力做好购销工作，就能促进粮食和多种经营的全面发展，不断壮大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帮助农民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重视农村商业，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对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意义。

毛主席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



去占领。”农村商业历来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的重要阵地，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为了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是企图让资本主义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在我们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叛徒、卖国贼林彪跟着刘少奇大肆鼓吹“四大自由”，妄图发展资本主义。当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形成以后，刘少奇、林彪一伙仍然贼心不死，大肆鼓吹自由市场、自由价格、自由竞争。他们兜售这一套黑货的险恶用心，就是为了让资本主义卷土重来，重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从流通领域打开缺口，割断城乡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也在一些地方的市场上兴风作浪，搞投机倒把，挖社会主义墙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斗争的实践告诉我们，做好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农村商业阵地上来。同时还要看到，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垮台了，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必然要在农村市场上反映出来。因此，农村商业阵地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还是很尖锐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或者通过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破坏生产；或者采取各种手段，腐蚀拉拢我们的一些干部，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把社会主义企业变为资本主义企业。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保持清醒的头脑，研究市场阶级斗争的特点，掌握对敌斗争的主动权。如果放松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放松了对农村市场的管理，放松了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甚至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听之任之，就会削弱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要紧密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进一步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依靠广大群众，切实加强市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反对资本主义



倾向，保护社员在农村集市上的正当交易，不断巩固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

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生产是基础。生产发展了，商品流通才能不断扩大，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才有可靠的物质基础。农村商业部门一定要把支援农业生产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通过购销活动，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要认真做好农业生产资料和社员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不失时机地把农副产品收购起来、调运出去，使商品流通渠道畅通无阻。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城乡物资交流，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如果不从生产出发，在购销工作中片面追求利润，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该收购的东西不积极收购，农村需要的物资不及时组织供应，就会削弱农村社会主义商业的力量，给阶级敌人搞投机倒把以可乘之隙。因此，我们要反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坚决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总方针的要求，做好农村商业工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地区的农村商业部门在支持生产、搞好购销工作方面，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例如：帮助社队认真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搞好生产规划，开展多种经营，并同生产队订立结合合同，把生产和收购结合起来，做到参与生产，指导生产，支援生产。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的需要，积极组织货源，及时供应，不违农时，当好农业生产的后勤。合理设置收购网点，充实基层收购力量，发挥农村代购代销店的作用，按照国家规定的政策，及时把各种农副产品收购起来。实践证明：凡是这样做的，农村商业工作就越做越活，路子就越走越宽，在支援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方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农村商业要认真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组织好工农业产品的交换，还必须不断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农村社会主义商业是新型商业。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社员群众服务，是农村商业职工的光荣职责。做好这项工作，体现着党和国家对广大社员群众的关怀。那种怕麻烦、嫌零碎、图省事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农村商业职工批判了资产阶级的经营作风，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许多地方做到了经营品种、服务项目适合社员群众的要求，购销形式、营业时间、手续制度有利于社员群众抓革命、促生产；许多商店在搞好门市营业的同时，还坚持送货下



乡，服务到队，购销结合，以卖带修，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我们要继续发扬这种精神，把农村社会主义商业办得更好。

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是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村商业阵地的斗争，同整个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下，各地区、各部门密切配合，广大群众参加，才能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农村商业网点分散，联系面广，政策性强，只有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监督，搞好企业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发挥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使企业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农村商业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实行贫下中农管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依靠群众监督的一种好形式。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农村商业在党的领导下，实行贫下中农管理，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更好地加强对商业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为农业生产和社员生活服务，更好地加强市场管理，对巩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起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要满腔热情地加以支持和爱护。那种认为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可有可无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应当看到，贫下中农是农民中的大多数，是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主力军。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是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在商业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因此，农村商业要不要实行贫下中农管理，是一个关系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问题。各级商业部门要正确对待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结合实际，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使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蓬勃发展，茁壮成长。

加强农村商业，活跃城乡经济，巩固工农联盟，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农村商业工作搞好了，整个商业工作就比较主动，城乡市场就更加繁荣兴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各级商业部门必须把农村商业放在重要位置上，积极帮助基层企业改进工作、解决问题。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进行，健康发展，形势大好。我们要抓紧抓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努力做好工作，树立全局观念，严格执行国家的统一计划和政策，不断巩固和加强农村社会主义商业阵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贡献。



文化大革命促进农业生产大发展

河北大名县杏现大队党支部

我们杏现大队，地处黄河故道的大沙滩。过去，两千九百多亩土地，全是沙土岗、茅草窝，自然条件很差。旧社会，风调雨顺的年头，一亩地也只能收个百八十斤粮食。解放后，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生产有了新的发展。干部群众想进一步把粮食搞上去，但是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亩产到了三百来斤，就再也上不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调动了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人变、地变、产量变，农业生产出现了一年一大步，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继一九六七年粮食亩产上《纲要》之后，一九六八年过“黄河”，一九七〇年跨“长江”，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连续两年超千斤。一九七三年的粮食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二点八倍。今年一千多亩小麦普遍生长良好，预计产量将超过往年。花生、棉花和林、牧、副、渔各业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较快地发展起来。

连续七年大幅度增产的事实又一次说明，路线是根本，群众是英雄，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就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农业生产，为革命事业多作贡献。

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焕发出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党支部对于怎么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很不一致。多数同志主张抓阶级斗争，推动生产斗争，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搞好集体生产。可是个别人认为：地主被打倒了，富农不富了，都是挣工分吃饭，抓阶级斗争也抓不来



粮食，主张靠开小片荒，增加自留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由于认识不统一，步调不整齐，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集体生产当然不会迈出大的步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联系实际揭发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加深了干部群众对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解。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个纲，就不可能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即使在某些方面有一点积极性，也很可能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根本搞不了社会主义农业，更不能使集体生产持续跃进。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我们越来越比较自觉地去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过去，我们队有的人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由于他们头脑里缺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把组织干部群众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作为根本大事来抓。大队办了政治夜校，选拔培养了一百二十名辅导员。根据社员的居住远近，由生产队办了五十个联户学习班。政治夜校定期学习，联户学习班分散学习，辅导员随时随地帮助群众搞好学习。几年来，根据形势和任务，采取有学有议的办法，联系实际，不断地组织群众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通过忆苦思甜，引导群众把自己的一镰一锄和革命的大目标联系起来，正确认识为革命种田是自己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的财富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坐等出来的。社员群众比过去，看现在，明确了方向和前途，懂得了劳动为了什么，就自觉地为革命吃苦耐劳，再苦再累心里也甜。

赶集上市，走亲访友，一早一晚，节日休息，这些时候和场所，往往容易被资产阶级钻空子，向群众散布封、资、修的毒素，腐蚀人们的思想，涣散革命斗志。可是，这种情况又往往被忽略。因此，我们针锋相对，坚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大队先后办起了业余文娱宣传队、图书室、电影放映小组、阶级教育展览馆、有线广播等，通过各种形式，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反对资本主义倾向，歌颂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批判封、资、修的旧思想、旧文化。



长期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结果，社员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成了推动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我们大队沙丘多，壕沟多，风沙大。迅速发展农业，就必须改变生产条件。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改变生产条件确实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天不怕、地不怕，千难万险踩脚下。大家说：“大寨能开山凿石，在虎头山上种出好庄稼，沙石峪能万里千担一亩田，在青石板上创高产，我们就能搬掉大沙丘，填平大壕沟，在黄河故道上绘新图。”正是依靠社员群众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几年来，我们搬掉了一百多个大小沙丘，填平了十条大小壕沟，在四个大风口上建起了七百亩防风林带，打机井三十二眼，平整土地两千七百多亩，修排水渠六条，实现了平均九十亩地一眼井，旱能浇，涝能排，旱涝都能稳产高产。

过去我们大队家底薄，缺资金，这对我们改变生产条件，是一个大的矛盾。是伸手向上，还是自力更生？是依靠外援，还是依靠自己？贫下中农通过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发扬。打井缺砖，我们就自己烧窑，植树造林没有树苗，我们就自己采树子，搞苗圃，自育自栽。能不买的不买，能自制的自制；工程较大，花钱较多的项目，在连年丰收、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过群众讨论同意，年终分配时，按照政策适当多留一些积累。大家说：明天来自今天，今天的长远利益，必然要变成明天的现实利益。众人拾柴火焰高，自力更生的伟力在于群众之中。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伸手向国家贷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初步改变了生产条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必须跟贫下中农商量。贫下中农有智慧，有远见，熟悉本地的土质、气候，最懂得怎样做才能多快好省。因此，生产建设的重大问题，例如一年生产计划的制订，年终分配方案的提出，重大生产建设的实施等，我们都首先让群众反复酝酿讨论，把群众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实行。这样，群众看到自己是发展生产的主人，就能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对待，去实现。而群众的意见，又往往比我们想得高明、正确。



一九七一年，我们大队粮食平均亩产达到八百八十斤。党支部在讨论下一年的生产指标时，多数同志提出，依靠群众，挖掘潜力，来年可以闯过千斤关。可是个别同志却流露出“歇脚”、自满的情绪，说什么：“沙碱薄地过长江，沙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要过千斤关，实在不敢想。”能不能闯过千斤关？我们组织群众进行了讨论，贫下中农说：我们为革命种田，就要甩开膀子迈大步，过了“长江”不算完，坚决闯过千斤关。党支部坚决支持了贫下中农这种革命积极性，带领群众总结经验，挖掘潜力，为实现闯千斤的计划艰苦奋斗。一九七二年，遇到了历史上特大干旱，一春无雨，威胁着小麦的丰收，夏收后干旱继续发展，严重影响夏播任务的顺利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散布流言蜚语，妄图瓦解我们的斗志。贫下中农没有被困难所吓倒，更没有被阶级敌人的谣言所动摇。大家批判了阶级敌人的谬论，斗志更加昂扬。在充分利用原有水利设施的同时，还自力更生开辟新水源，采取人力、畜力换班，机器不停的办法，昼夜抗旱浇水。天大旱，人大干，秋后粮食亩产达到一千零六十一斤的好收成。这一事实，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群众的力量能胜天，群众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生产潜力就能一挖再挖，粮食产量就能一增再增。

从此，我们更加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党支部定期开门整风，听取群众的批评，接纳群众的建议；坚持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从劳动中总结群众的发明创造，表扬群众的先进事迹，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恰当地组织群众搞好生产。社员群众看到干部真心实意的尊重自己，就经常及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向干部提出来。过去，我们大队只种粮食，不搞多种经营。后来，我们采纳了群众的建议，把村边五个废坑塘加工整理，放养鱼苗，在路边、渠岸植树造林。还大力发展了养猪业，全大队集体和社员家庭养猪达一千四百多头，平均一人一头多。同时，搞起了油坊、粉坊、砖窑、编织等副业，每年为农业提供资金七万多元，使农、林、牧、副、渔都有发展。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依靠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深深感到，我们前进的步伐还远远赶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今后，我们决心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抓革命，促生产，进一步加快农业发展的步伐，为革命做出新的贡献。



批林批孔推动了技术革新

——天津自行车厂的调查报告

天津自行车厂是一个有三十八年历史的老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厂的生产发展很快。一九七三年产量达到八十六万辆，相当于一九六五年的二点四倍。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乡市场对自行车的需要不断增长，要求这个厂迈开更大的步伐。今年以来，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厂大力开展技术革新，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了一百七十五项技术革新，新建了自动化、连续化生产线六条，制造和改造了一大批设备，把企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推进到年产近百万辆的新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自行车产量月月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三；五个月的产量，等于文化大革命前最高年份一年的产量。

为什么在这几个月之内，企业的面貌出现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厂的工人们说得好：“因为有了批林批孔的思想基础。”批林批孔促进了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开展，使蕴藏在群众中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得到了发挥；批林批孔打破了许多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使干部、群众的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这就带来了技术革新和生产的大发展。

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天津自行车厂技术革新的蓬勃开展，是这个厂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批林批孔的结果。开展技术革新，进行老厂改造，贯穿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着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如果不从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解决思想上政治上前进与倒退的问题，生产技术领域里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就不能真正得到解决。今年以来，这个厂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积极投入批林批孔斗争，深入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批“复礼”，促前进，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工人们说：林彪要拉历史倒退，我们不但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击退复辟、倒退的逆流，而且要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



历史前进。如何使老厂、老设备更好地发挥潜力，适应革命的需要？大搞技术革新，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问题，就摆在人们面前了。电镀车间镀锌工序是生产上的短线，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他们早在去年下半年就着手搞一条震动式的镀锌自动生产线。但由于按“常规”办事，按部就班地搞设计、搞试验，用了半年时间只完成一半的工作量。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工人、干部满怀革命激情，再也不满足于这样的进度了。群策群力，仅用了八天时间，就把余下的一半工作量统统完成了。震动式镀锌自动生产线在批林批孔中胜利建成了！在电镀车间的影响下，全厂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迫切要求以批促干，大干快上。厂党委因势利导，四月份全厂开展了一个技术改造的会战。全厂职工怀着对林彪一伙搞复辟倒退的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坚持大干苦干，二十五天的时间，实现了一百多项革新，完成了平时至少半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原先搞了多年没有搞成的技术革新项目，经过十天、二十天的群众奋战搞成了；一些多年没有解决的技术难题，群众发动起来后很快解决了；一些专家、权威认为不能搞或搞不成的新工艺、新设备，工人们搞出来了。工人、干部普遍反映：从来没见过群众的热情这么高涨，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在短时间内取得的效果这么显著。

要把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必须用唯物史观战胜唯心史观，在领导思想上真正解决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自行车厂党委体会到：是否相信和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反映。相信和依靠群众，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并不容易，这绝不是经过一次运动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而是要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才能解决。例如有人说：搞生产，可以搞群众运动；搞技术改造，不好搞群众运动。又有人认为：搞小改小革发动群众可以，搞大型自动生产线，靠群众运动不行。还有一些同志，他们一般地也承认开展技术革新要依靠群众，但他们只注意一部分技术比较全面的机修工人，而不注意去发动占多数的在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工人。为什么这些同志在口头上也讲相信群众，一碰到实际问题却忘记广大群众了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批林批孔中，厂党委领导成员深入到车间班组，和广大工人、干部一起批判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生而知之”、“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通过批判，各级领导成员进一步认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理，增强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广大工人群众也进一步认识到“**实践出真知**”的道



理，更加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这个厂今年搞的一些重大的技术改造项目，如震动镀锌生产线、卷钢纵剪连续生产线、曲柄机加工自动生产线、电镀自动生产线、挡泥板自动画线机等，全部都是工人群众参加设计搞出来的。不但机修工人积极参战，连以前很少参加技术革新活动的生产操作工人，在技术改造大会战中也十分活跃。广大操作工人冲破“上智下愚”的精神枷锁，在技术革新中大显威力，是这个厂今年以来开展技术革新的一个特点。车圈车间的磨口工序，过去是三十年代落后的工艺操作，每个人最多一天磨六百个车圈，磨一个车圈要倒腾四次，劳动强度很大。文化大革命前，工人们多次提出要改革这道工序，却始终没有下文。批林批孔以来，磨口工人决心自己动手搞自动磨口机。他们在工余时间凑在一起，把各自的操作手法归纳、分解为机械动作，分别在自己使用的设备上进行了多次试验，提出了五个方案。然后，又把这些方案中的精华加以集中，确定了一个方案。车间党支部发动全体机修工人、技术人员同操作工人一起进行讨论，完善了这一改革方案。结果从设计到投产，仅用了七天的时间，就制成了一台车圈自动磨口机。这台设备凝结着操作工人的智慧，采用了许多先进技术，它可以一下就完成人工磨口的四个动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劳动强度，节省一半劳动力。这一仗的胜利，大长了工人志气。这个厂今年实现的技术革新项目，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以操作工人为主或有操作工人参加设计的。许多车间女工也打破“男尊女卑”的精神枷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搞了不少革新项目。广大操作工人同机修工人一起登上设计舞台，这就使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开展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必须广泛地实行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天津自行车厂今年在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中，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批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鞍钢宪法”规定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进一步得到落实，广大工人意气风发，广大技术人员的世界观也在不断转变，使“三结合”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通过批判反动腐朽的孔孟之道，广大技术人员进一步认识到：知识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技术人员必须积极投入群众运动，和工人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才真正有用武之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多的贡献。现在，许多技术人员不脱离现场，不脱离工人，不脱离劳动，发挥自



己的特长，当群众的参谋，和工人在一起，共同搞设计，一起造机器。有的技术人员过去习惯于闭门造车，耳目闭塞，还摆架子，碰见问题躲着走，解决问题慢腾腾。在这次会战中，却把图板搬到了会战现场，说：“我这图板就放在这儿，不再搬回办公室了。”工具车间过去靠少数人关起门来设计车把立管缩头切口机，两个月一张图纸也没画出来。这次会战中，车间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结合在一块，大地做图板，粉笔画线条，七嘴八舌讨论了一个多钟头，方案就凑出来了。大家高兴地说：批林批孔促使“三结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开展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党委要热情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支持新生事物。天津自行车厂在这个问题上也曾遇到一些思想障碍。有的人迷信专家权威，对群众性技术革新总是喜欢评头品足，讥笑群众运动缺乏科学性，苛求群众革新只能一次成功，而不允许有一点挫折。自行车厂党委批驳了这种错误观点。他们认识到：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搞群众运动，合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态度；科学是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了群众的实践，什么科学也不会有。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热情支持工人群众的大胆设想，不怕花点学费，准备顶住暂时失败后的一瓢冷水、一股冷风。厂党委的同志说：人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为什么不允许群众搞革新有几次反复，花点学费呢？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从中得到经验教训，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革新可以一次成功，有些革新要反复几次才能成功；统统要求一次成功，那是形而上学的，不科学的。事实上，许多技术革新，专家搞也不能保证成功，为什么苛求群众一次搞成功呢？实践总是这样证明：少数人闭门造车搞革新，出的乱子不少，浪费很惊人；相反，凡是发动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群策群力搞的技术革新，由于集中了大家的智慧，考虑总是比较周到，付的学费并不大。象天津自行车厂这次搞的一百多项技术革新，基本上都是成功的，多数已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在批林批孔中，这个厂的党委抓住刘少奇、陈伯达在天津自行车厂散布的“工人搞革新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等谬论，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武器，发动群众进一步深批了洋奴哲学。工人们说：在刘少奇、林彪、陈伯达这些家伙的眼里，只有洋人，没有我们工人，只有资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我们要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根本不信刘少奇、林彪那一套。通过批判，广大工人、干部、



技术人员决心进一步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这次他们搞的那么多的技术革新，基本上都是学创结合，立足于创。象自行车挡泥板装饰线，历来是用手工画的，费工费时。以前曾有专家研究过把它改为自动化，搞了半年多没搞成。有的人听说外国现在也还是采用手工画线，对这项革新就根本没有考虑。这次群众运动一起来，二十几个工人组成攻尖小组，边研究、边实践，不到一个月，就把本厂独创的动画线机搞了出来，基本上解决了这个技术难题。

群众有智慧，有改变生产条件的强烈愿望；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就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今年三月，国家把一批大型卷钢分配给自行车行业改制成带钢，在生产上使用。在通常情况下，要把这种重达五吨、宽一米半的卷钢加工改制成一条条的带钢，需要一、二百万元投资，新建一千平方米厂房。自行车厂的工人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到领导说：“我们要学大庆，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土法上马，不要投资，就地搞改造。”工人们促使领导下了决心。厂党委决定搞一场制造卷钢纵剪连续生产线的会战。这条生产线，包括五吨重的龙门吊车，两吨的桥式天车和架料机、引料机、劈料机、卷料机等六台大型设备。许多大件的加工都是自行车厂原有的设备适应不了的。工人们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修旧利废，以小干大，一一把它解决了。不新建厂房，机器往哪里安装？工人们一研究，尽量紧缩准备车间现有厂房的生产用地，再不够，就把车间大墙打开，在墙外面安装了架料机，立起了龙门吊车。就这样，问题解决了。整个生产线的建成，只用了十七天时间，百分之四十的机件用的是废旧件，没建一平方米厂房，花了不到七万元。工人们说：“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造出了这条生产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天津自行车厂的事实又一次证明：批林批孔这场伟大的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必然会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生积极作用。批林批孔将把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推向新高潮。

天津市革命委员会
轻工业部 联合调查组
天津市第一轻工业局



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

上海市毛麻纺织工业公司党委会

羊毛衫的生产，长期以来一直是“手摇、口念、心记”的手工操作。以前，虽然进行过几次技术改造，但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的落后面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依靠工人群众，自己动手，用电子新技术改造了三十年代的旧针织横机，使我们的羊毛衫行业实现了生产自动化、半自动化，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去年在设备不增、人员减少、品种增加的情况下，产量比一九六六年增加百分之五十二，比一九五八年翻了一番。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羊毛衫八厂的工人群众又奋战一百天，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子群控羊毛衫车间。

我们羊毛衫行业生产面貌的巨大变化是靠什么得来的？靠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靠的是工人群众的巨大创造力。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几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要相信和依靠工人群众。我们羊毛衫行业在电子技术改造过程中，曾经碰到一系列的问题，技术改造的“样机”从哪里来；怎样看待工人群众的智慧和实践经验；怎样对待群众中涌现的新生事物？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斗争的焦点，还是要不要依靠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开始，我们曾经认为，用电子技术改造旧横机，过去从来没有搞过，还是先进口几台“样机”，比较“靠得住”。但是，有一件事对我们的教育是很深刻的。外地某毛纺厂花了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进口一套八台羊毛衫自动横机，打开一看，主轴断了，急电这个国家，但回电说：“你们把箱子打开过了，我们一概不负责。”后来这些自动横机，由于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直派不了用场。这件事使广大工人群众强烈地感到：要发展生产技术，首先应当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靠



广大工人群众，立足于自力更生，而不能把希望寄托于从外国进口。工人群众说得好：只要有志气，就会有“样机”！这种志气，就是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什么外国有的，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就不能创造出来？事情往往这样，外国资产阶级越是卡我们，我们斗得越狠，反而前进得越快。不久，第十六羊毛衫厂工人就用土办法试制成一台光电式电子控制半自动横机，接着，第八羊毛衫厂工人也创造出一台数控式电子控制半自动横机。事实教育了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的力量，外国有的，我们也能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能创造出来。

我们说，自力更生的力量在群众之中，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革命阶级。“**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工人群众长期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中，有着无穷的智慧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群众，能够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改造技术、改造生产的有力措施，迅速地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有些同志正是由于看不到这一点，因此往往对坚持自力更生的道路信心不足。有人说：工人不懂ABC，怎能搞电子？有人说：没有设备、条件，靠什么搞电子？确实，工人群众刚开始接触电子技术，困难碰到不少。电子技术图纸看不懂，红红绿绿的小零件也叫不上名称，技术力量薄弱，设备条件很差。但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不懂电子技术怎么办？工人同志坚信，实践出真知，不懂可以学。第九羊毛衫厂百分之八十是中老年女工，文化程度都比较低，工人们为了长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就边干边学，不懂ABC，就回家叫子女教，不懂电子元件，就给它们取个形象化的“代号”。这样，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厂在挡车女工中普及了有关电子技术的一些基本知识。有十八个女工大胆实践，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装出十八台电子控制箱。没有专用设备怎么办？工人就用土办法解决问题。九厂搞光控式横机时，需要加工一种齿轮，到外面去加工要花钱费时间，他们就到五金店里租了一把铣刀，改革了工夹具，在车床上照样加工出符合要求的齿轮来。缺少零件怎么办？工人们在紧急关头也能“逼”出办法来。第四羊毛衫厂在装置电子控制箱时，缺少一种电子元件，外面一时买不到，眼看要影响革新进度。有个青年工人日夜动脑筋，想办法，根据“接触”开关的原理，大胆设想，采用原子笔芯代替了光电管。由于依靠了工人群众，把原定



一百零五天工作量的任务，只用了十二天时间就完成了，而且还为国家节约了资金。这些事实，生动地证明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要坚持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发挥群众的集体智慧，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依靠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须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是有教训的。当第十六羊毛衫厂工人群众创造的一台光电式控制半自动横机刚出现时，我们有的同志认为它低级，因此没有热情地加以支持。而工人群众听到这个消息，纷纷到十六羊毛衫厂去学习取经，第九羊毛衫厂的工人群众，回厂后马上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在全厂迅速推广，成为我们羊毛衫行业中第一家推广电子控制横机的工厂。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待群众的态度问题。对群众中出现的新生事物不支持，不表态，任其自生自灭，甚至对新生事物的某些缺点横加指责，实际还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后来，在九厂出现了改进光电式横机的典型经验时，我们就及时在全公司介绍、推广，把技术改造的群众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经过广大群众的努力奋战，仅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使十四个羊毛衫厂实现了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其中一半以上的横机应用了电子控制。

但是，当电子控制横机开始大量推广后，又普遍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产量不稳定。这时有的人指责用电子技术改造横机是“得不偿失”，甚至怀疑用电子技术改造横机“有没有前途”。是前进，还是倒退？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教导，认识到，产量不稳，这反映了新事物刚出现时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还有某些缺点和弱点。但是，这种不完善，这些缺点和弱点是完全可以实践中加以克服的。不允许新生事物有一个完善的过程，只许它一出现就十全十美，实际上是不准群众革命。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产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是挡车工扩台后操作不熟练，这是“新机”与操作方法之间的矛盾。问题找到了，我们发动工人群众，广泛地开展操作练兵，及时召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形成一套适应“新机”的比较完整的操作方法。这就使产量不仅稳定下来，而且大幅度上升了。

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保证，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愿望和要求。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就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大搞社会主义协作。我们羊毛衫行业的技术改造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果，这不是光靠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群众的努力，而是依靠了全市工人阶级的力



量才实现的。我们羊毛衫行业，大部分都是小厂，设备简陋，技术力量薄弱，搞这样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过去我们曾认为条件不成熟。但是，技术改造的群众运动一开始，全市各行各业五、六十个单位都伸出了支援的手，组成了大会战的生动场面。有的协同攻关，派来了“技术服务队”，有的主动承制零部件，甘当配角。把我们的困难看作是他们的困难，把我们用电子技术改造旧机的任务看作是打政治仗、争气仗。我们羊毛衫行业技术改造的成果，是工人阶级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

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的技术队伍，这是**依靠群众**，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重要保证。我们羊毛衫行业中过去没有懂电子技术的人材，实现电子技术对旧机的改造，技术力量从哪里来？这是我们当时最担心的一个问题。而工人同志却满怀信心地说：自己动手改造旧机，掌握电子技术也得靠自己！工人们这种为中国工人阶级争气，为改变生产落后面貌而迫切要求学习电子技术的愿望，对我们教育很大。为了使工人群众迅速掌握电子技术，我们举办了电子技术短训班，几年来办了八期，帮助各厂培养了四百五十多名电子技术人材。这些学员回厂后，又在厂里当教师，起着滚雪球的作用，形成了一支更大的电子技术队伍。这支队伍在实践中边干边学，成长很快，在技术改造中起到了骨干作用。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是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归根结底还是由世界观决定的。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必须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刘少奇、林彪一伙推行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就是从反动的唯心史观出发，不相信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有无穷的智慧 and 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公司的工人群众，也曾提出过技术改造的要求，但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没有实现。实践证明，依靠工人阶级，自力更生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忘记了工人阶级，就只能滑到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

当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全公司的工人群众正在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我们决心，更加紧密地依靠工人群众，坚定不移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为建设社会主义攀登新的高峰，夺取新的胜利。



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胜利前进

英雄光辉照银幕

——评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

江 天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二周年之际，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与观众见面了。这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是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新胜利。这两部彩色影片，在《智取威虎山》等十部革命样板戏影片成就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创造，在导演、摄影、美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影片构思严谨，拍得很生动，很有气势，使人看了很受鼓舞。

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必须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遵循“还原舞台，高于舞台”的摄制原则。它的核心问题，是要充分调动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段，进一步塑造和突出样板戏的英雄人物，特别是主要英雄人物。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通过电影艺术的再创造，使赵勇刚、柯湘这两个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更加丰满高大，更加光彩照人，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第一，影片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正确处理人物关系，激化矛盾冲突，更突出地表现了赵勇刚、柯湘的英雄气概。

在处理主要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的关系时，影片始终让赵勇刚、柯湘处于斗争的主导地位。《平原作战》“爆炸军火”一场，是赵勇刚同龟田的正面交锋。影



片先以一个稍俯的横移全景，表现了车站外龟田与日寇兵架枪亮刀，如临大敌的场面。然后是赵勇刚化装火车司机稳步出场的近景。这里，利用镜头衔接所产生的对比作用，强化了矛盾冲突，渲染戏剧气氛，以敌人外强中干的凶相，反衬了赵勇刚闯虎穴、入龙潭的英雄胆略。当龟田要没收以烟土伪装的炸药箱时，一个变焦距镜头，从全景快速推成中景，拍摄了赵勇刚挺身踏箱、敞怀露枪的“亮相”，有力地突出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杜鹃山》“砥柱中流”一场，表现柯湘与温其久的尖锐冲突，也有精采的处理。开始影片用一组镜头，充分表现温其久兴风作浪、色厉内荏的形象。同时三次插入柯湘对温其久怒目谛视、冷静观察的镜头，以动衬静，欲扬先抑。当温其久煽动战士冲向隘口的时候，用一个反拍的大全景，表现柯湘和党支部的同志们在镜头前景的山石上，坚决地挡住人流。接着，一组短促分切的镜头，通过景别与角度的巧妙处理，拍摄柯湘以泰山压顶之势，步步紧逼，严词诘问温其久，强烈地渲染了她力挽狂澜，砥柱中流的反潮流精神。

影片的摄制经验告诉我们，当主要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两军对垒、正面交锋时，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就是主要英雄人物只身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也仍然以英雄为主导，敌人为陪衬。柯湘的出场，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影片首先用俯拍的镜头和阴暗的色调，描写了众匪团丁凶恶丑陋的形象，渲染了刑场上黑云压城的气氛。随着镜头从祠堂门外的大全景缓缓推降成铁门门环的特写，传来柯湘“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的震荡长空的画外音，造成先声夺人的气势。在一个仰拍的全景中，柯湘昂首挺胸，迈步出门。镜头按照音乐的节奏，迅速有力地切近，展现了她的“亮相”。雪白的上衣，鲜红的血痕，强烈的顶逆光，明亮的追光，把她蔑视群敌、器宇轩昂的英姿表现得格外鲜明。这组镜头充分表现了柯湘“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努力在银幕上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是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是阶级斗争现实的必然反映。那种所谓正反面人物要“轮流突出”，“谁有戏就把镜头给谁”的论调，其实质是要反面人物向英雄人物争“戏”，争“镜头”，争“中心地位”，这是修正主义文



艺黑线流毒的一种反映。如果不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就必然会导致反面人物处于银幕的中心，造成“正不压邪”的恶果。

我们反对在银幕上突出反面人物，“正不压邪”，同时也反对把反面人物搞成一指就倒的稻草人，“邪不衬正”。英雄人物是和反面人物相比较、相斗争而存在的，不认真揭露反面人物的假、丑、恶，就不可能充分展示英雄人物的真、善、美。《平原作战》对龟田的处理，分寸适宜，恰到好处。影片确实给了龟田不少镜头，但我们并不因此觉得是突出了龟田。即使在单独描写龟田的场次里，也处处通过他的活动，反衬了赵勇刚。譬如“日寇诡计”那一场，一个急速升起的俯摄镜头中，龟田沮丧坐下，孤身只影，走投无路，恰似一头跌落陷阱的困兽，有力地反衬了赵勇刚的强大威力。在龟田策划假“清剿”、真进山的阴谋时，镜头又缓慢地下降推进，使人看到他狡诈险恶的内心，虽是困兽也还要作垂死挣扎。这就为赵勇刚在青纱帐里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仔细分析敌情，识破龟田的诡计，作了有力的铺垫。

影片还出色而感人地表现了主要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展示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因而对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起到“绿叶扶花花更红”的作用。《平原作战》“不屈不挠”一场，精心拍摄的那棵根深叶茂的槐树，就是伟力深厚、立地顶天、打不垮、推不倒的人民群众的象征。张大娘、李胜、小英和其他张庄群众映着火光、怒视敌人的集体造型，使观众形象地看到张庄的人民群众确似一道铜墙铁壁。张大娘壮烈牺牲，小英抚娘恸哭。这时，影片给小英一个长镜头，让她尽诉心头的悲愤。小英这段“西皮滚板”的录音很清晰，达到声画交融，感人至深。影片在这里出色地表现了人民群众，同时也表现了赵勇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说明“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勇刚”。赵勇刚和群众一起悲愤地抬走张大娘的遗体后，影片从大槐树的特写，叠化摇出赵勇刚。他心如刀割，悲愤万分，拿起张大娘的遗物——一把为抗日斗争磨弯了缺口的铁锹，低头凝视。这时，银幕上出现了特写：晶莹的泪珠落在铁锹上面。这铁锹，这热泪，包含着多么丰富的革命内容，蕴藏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这个精心设计的特写镜



头，把工农的儿子赵勇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揭示得十分深刻，格外感人。

在处理主要英雄人物和其他正面人物的关系时，影片同样着力刻画主要英雄人物；同时也注意对其他正面人物的塑造，用以烘托主要英雄人物。影片《杜鹃山》主次分明地处理了柯湘和雷刚的关系。“情深如海”一场，是柯湘和雷刚正面冲突的第一个高潮。当柯湘对雷刚违反党的政策的错误行为进行耐心教育时，雷刚勃然大怒，踹凳拍刀，逼视柯湘。这时，全场气氛紧张。为了突出柯湘，保持舞台演出寓动于静的特点，影片没有把镜头分切过碎，而是用一个全景拍摄双方对峙的静场。然后，镜头缓缓地推向柯湘，使观众看到她从容镇静的表情，展示了她坚持原则、团结同志的崇高思想境界。在“雾岭初晴”一场，当柯湘用血的教训启发雷刚时，影片多次用近景表现了雷刚的激动心情，不仅表现了他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而且用雷刚的觉醒，有力地衬托了柯湘。

第二，影片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注意细节描写，拍好核心唱段，更加深刻地展示了赵勇刚、柯湘的革命精神面貌。

电影主要是视觉艺术，能够非常直接、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动作和表情。影片的摄制者恰当地利用了这一特长。例如，在《杜鹃山》“砥柱中流”一场中，杜妈妈身遭不幸，雷刚莽撞下山，一阵阵的狂风向柯湘扑来。在全剧矛盾冲突的这一高潮时刻，影片抓住柯湘阻止小山下山之后，激动、悲愤地抱住小山的瞬间，拍摄了她的特写：忍含热泪，强抑怒火，向小山倾吐肺腑之言。这个镜头细致地描绘了柯湘对阶级亲人的深厚感情和坚持党的原则的革命精神。又如影片用特写和近景，两次表现了田大江的药葫芦，造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它前后呼应，以物托人，揭示了雷刚和田大江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特别是田大江牺牲后，雷刚手捧药葫芦，见物思人，悲恸呼喊大江时，更为动人心弦。细节描写，不但能够很好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也可以很好地刻画人物的外形。《平原作战》的武打场面和武打动作，拍摄角度好，有特色，很漂亮，同时镜头的分切和音乐的锣鼓点结合紧密，成为刻画英雄人物不可缺少的部分。如“智取炮楼”那场，就多次运



用特写镜头拍摄了赵勇刚用车鞭打落日寇军曹手枪，用脚挑刀，砍杀敌人，以及其他英勇格斗的动作；随着锣鼓的节奏，又用变焦距镜头拍摄了赵勇刚英武的“亮相”。这些镜头，生动地表现了赵勇刚威武雄壮的战斗风采。

革命样板戏中的核心唱段，是揭示主要英雄人物革命精神面貌的关键。这两部影片根据唱段的内容、音乐的节奏与演员的表演，细致准确地设计了一整套镜头，通过镜头的运动和内部调度，画面构图的组成与变化，光线色彩的描绘和对照，有声有色地拍摄了赵勇刚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我永不迷航”和柯湘的“壮志凌云”两个核心唱段。伴随着赵勇刚的歌唱，银幕上出现了月色微黄的夜空，一望无际的红高粱；衬托着柯湘的唱段，画面上出现了迎着滚滚乌云巍然屹立的峭石，顶着阵阵狂风倔强昂扬的劲松。情景交融，寓情于景，为刻画人物的革命精神面貌提供了特定的环境气氛，对他们的英雄气概作了形象的烘托。在这一段中，既保持了唱段的连贯和舞蹈动作的完整，又突出了演员激情饱满的表情和明亮细腻的眼神。当我们看到赵勇刚遥望延安城，柯湘遥望井冈山，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瞩望而力量倍增、心情激荡的画面时，都会为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崇高精神境界所感动。

第三，影片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手段，增强环境描写，渲染时代气氛，更有效地烘托了赵勇刚、柯湘的高大形象。

在舞台演出的基础上，影片利用电影具有更多表现空间自由的便利条件，根据每场戏的特定情景，合理地延伸两侧，丰富主体景，适当增加群众场面，为主要英雄人物提供了革命斗争的广阔背景。

刻画社会环境，要符合历史真实，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达到整个历史时代的普遍性与具体环境的特殊性的统一。影片《平原作战》，导演构思很有特色。在社会环境描写上，也进行了成功的再创造。“日寇诡计”一场的开头，利用幕间音乐提供的形象，特意增设了一队日寇伤员，垂头丧气、狼狈不堪地从龟田办公室外鱼贯而过。这一场面，形象地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面前惨遭失败的可耻命运；同时与第二场日寇疯狂枪杀抗日群众



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把赵勇刚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衬托得更加光彩。影片《杜鹃山》“春催杜鹃”一场，用横移镜头，更开阔地展现了三官镇祠堂前刑场的情景，集市冷落萧条，匪兵如狼似虎，反映了二十年代末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历史面貌。在柯湘刑场斥敌的时候，又增加了群情激愤、怒视敌人的场面，表明人民群众不甘于被奴役、受压迫，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衬托了柯湘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坚强性格。

在自然景物描写上，两部影片也有新的创造。它们都增设了水，但出于不同的剧情需要，各自又包含着不同的内容。杜鹃山上的泉水，清澈明亮，欢快流淌，加上蓝天白云，青山翠竹，烘托出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茁壮成长的生动局面。而华北平原某城火车站月台旁的积水，却是污秽不堪，一洼死水。一只只鬼子的皮靴，在里面慌乱地践踏，不正是日本侵略者在赵勇刚出奇制胜的打击下，如陷泥塘、难以自拔的形象写照吗？一部影片拍了火，一部影片拍了花，也各有寓意。张庄的冲天大火，一方面说明了敌人的疯狂残暴，另一方面又烘托出赵勇刚和抗日军民心中的愤怒之火，斗争之火。田大江为掩护战友，壮烈牺牲，影片从热血涌出指缝的特写，叠化出如血似火的杜鹃花。看到这里，谁能不为田大江“光华照河山”的英雄形象而深深感动呢？田大江的成长，是柯湘用革命思想启发教育的结果。那满山遍野鲜艳夺目的杜鹃花，既是象征着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也是对柯湘的热情赞颂。

继《智取威虎山》等十部革命样板戏影片之后，革命现代京剧彩色影片《平原作战》、《杜鹃山》的拍摄成功，表明革命样板戏影片的拍摄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但是，这两部影片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有些夜景用光不够讲究，光源不清，缺乏层次。这是今后需要注意和改进的地方。我们应当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认真总结经验**”的教导，对于摄制革命样板戏电影的丰富经验，进行认真总结，找出其中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推动社会主义电影事业的进一步繁荣，让工农兵英雄形象在银幕上闪耀着更加灿烂的光辉！



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

——评越剧影片《半篮花生》

方 进

近几年来，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一个群众性的文艺创作运动在各地蓬勃兴起。小戏（包括话剧、各种地方戏曲在内）的创作和演出十分活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剧目，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了工农兵在各条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展示出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的大好形势。这些作品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许多小戏所不能比拟，就是从艺术质量和作品数量上来看，也大大超出了过去的水平。

现已拍成彩色影片，在全国开始上映的越剧《半篮花生》，就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这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半篮花生》以小戏的有限篇幅，生动地反映了贫下中农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具体矛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很有新鲜感，应当受到热情的称赞。

《半篮花生》所以能达到目前这样的水平，是经过了重大修改之后获得的。这个提高的过程说明，要搞好革命文艺创作，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它还说明，对于党的文艺事业，一定要严肃认真，即使是一个小戏，也要反复磨炼，不断修改。

《半篮花生》是一个正面反映贫下中农“学哲学，讲矛盾”的文艺作品，剧情是紧扣住学习《矛盾论》展开的。如何通过剧中人物形象正确体现毛主席在这篇光辉哲学著作中精辟论述的唯物辩证法，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原先的剧本中，只讲了矛盾的普遍性，没有讲矛盾的特殊性，这就违背了《矛盾论》的原意，违背



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十分重视矛盾的特殊性，深刻论证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指出了不仅不同的事物各有其特殊性，而且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阶段也有特殊性，并着重指出矛盾的共性（即普遍性）包含于一切个性（即特殊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因此，这个剧本到底能不能正确提出和描写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道理，便成为它能否改好的关键。

应该说，现在同观众见面的《半篮花生》，已经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从而使剧本的思想艺术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一出戏，不能光凭剧中人物之口去演说哲学的道理。那么，如何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戏剧情节，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辩证关系，自然而生动地体现出来呢？剧本的修改，遵循党的基本路线，把原来在剧中没有出场的王有财这一人物，从富裕中农改成了摘帽地主。这一修改，起了重要的作用。农村秋收时节，小学生在课余时间拣点“地脚”花生，本来是一种普通的现象。为什么这半篮花生，竟如一石激水，在一个亲亲热热的贫下中农家庭掀起了矛盾冲突的波澜？这是由于摘帽地主搞的鬼，使这半篮花生大有文章：原来它根本就不是“地脚”货，而是王有财故意在浮土里藏下花生，叫他的儿子来约晓华去拣，“妄图把贫下中农作为挡风墙”。这具有特殊内容的戏剧冲突，揭示了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普遍性。

剧中的晓华爹，是一个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贫下中农的英雄人物。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敏感和觉悟，是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矛盾、观察事物的结果。当一家人为晓华拣回来的半篮花生闹矛盾时，他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是脱离实际、泛泛而论地评判是非，而是从实际出发，从矛盾的特殊性出发，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提出了一连串疑问：“为什么‘地脚’会有这么多？为什么蛮好的花生丢田间？为什么小宝前来约晓华？为什么村里又有流言传？”经过调查研究，他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弄清了地主在背后破坏，利用拣“地脚”来挖集体经济墙脚这一事情的真相。

《半篮花生》把劳动人民内部的思想矛盾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把认识路线同政治路线联系起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它说明，认识路线正确了，才能深刻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才能正确分析和处理好实际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红日心头照，真假能分辨”，晓华爹掌握了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尖锐武器，因而在“田里增米粮，山头竹木旺”的丰收景象面前不忘阶级斗争；



又从“半篮花生”所反映出来的这一特殊的阶级斗争中，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认识。所以，修改后的剧本把王有财改成摘帽地主，就不单是个改变人物身份的问题，而是用一根阶级斗争的线索把戏剧冲突贯穿起来了。它既赋予矛盾以特殊性，同时也使主题思想更具有普遍意义。只有充分揭示出“象王有财利用‘地脚’挖‘墙脚’这样一个特殊矛盾”，才能看到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半篮花生》给人以深刻的思想教育，就在于此。

修改后的《半篮花生》，矛盾冲突大为加强，也深化了。这对于正确反映“贫下中农学哲学，要同三大革命紧相连”的革命学风，对于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剧中有一段描写很精彩：一家人坐下来分析“半篮花生”的矛盾，天真烂漫的晓华，在知道花生还没有煮、可以马上给队里送去的时候，就宣布：“矛盾已经解决啦，散会，散会！”但事情到这里，实际上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晓华爹用“有了矛盾，就不能掩盖、调和，要彻底解决，就得充分揭露”的道理，引导大家进一步分析矛盾，终于搞清矛盾的来龙去脉，解决了问题，使一家人都感到“这个会开得真好”。“哲学解放到山洼，尖锐武器工农拿”，晓华爹这一形象，生动地表明劳动人民最热爱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的斗争实践，“工农兵就是能攀登哲学山”。这对林彪宣扬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的无耻谰言，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剧中王有财散布“丰收以后无矛盾”的流言，是为了掩盖他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进攻。晓华爹心红眼亮，丰收不忘抓大事，从“半篮花生”中捉住狐狸尾巴，揭穿阶级敌人的谎言。这对林彪宣扬孔孟的“中庸之道”，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一个迎头痛击。

《半篮花生》的修改和提高，对于我们认识小戏创作的特点和规律，是很有启发的。在小戏创作中有所谓“以小见大”的说法。我们认为，“小”和“大”也是对立的统一。何谓“小”，何谓“大”，都是有其具体内容的，不能把它抽象化、绝对化，不能认为任何的“小”中都能见“大”。以“半篮花生”之“小”，见阶级斗争之“大”，这要有条件，即在“半篮花生”中确有阶级敌人的捣乱，所以才能从这一矛盾的特殊性中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如果仅仅是一些家庭琐事中的小风波，又何以能见这阶级斗争之“大”呢？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题材本身是有重大和琐屑之分的。只抓住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会因选材不严而开掘不深，做不出什么大文章来。



《半篮花生》的创作表明，小戏选择的事件，尽管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和片段，但总要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才谈得上“以小见大”。这就需要“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而典型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使人物的个性和共性、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辩证地统一起来，以个性表现共性，从特殊性揭示普遍性。为什么在有些小戏中，会出现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的雷同？就是由于不注意矛盾和斗争的特殊性的结果。而那种把情节建立在“误会”、“巧合”上面的作品，使人看了无法置信，又是由于否认矛盾和斗争的普遍性所致。这两种情形，都不能做到把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透过生活现象反映生活的本质。

《半篮花生》的创作还表明，在处理矛盾特殊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上，小戏可以从小处着手，但必须从大处着眼。着手时要发扬小戏短小精悍的优越性；但立意要高，要着眼于在一个短短的小戏中如何更为深刻地表现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思想，以克服其容量较小的局限性。以小戏之“小”，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之“大”，其实也是一种“大题小做”。这样，小戏创作才能起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作用。

《半篮花生》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矛盾的特殊性这一重要问题，现在基本上讲清楚了，但如何把这个哲学道理通过人物和情节融会贯通起来，处理得还不够理想。晓华爹靠台词解说较多，靠行动本身去说明问题还较少。造成这一缺点的原因，是由于戏剧矛盾的中心还没有完全集中在晓华爹身上。这个问题是在原先的剧本中就存在的。现在的修改虽作了很大努力，还没有完全扭转过来。台上几组人物关系中矛盾的对立面都是晓华娘，这就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到她身上，所以总是她显得活跃。观众的注意力，是以矛盾的中心究竟在什么人物身上为转移的。只有让主要英雄人物成为戏剧矛盾的中心，作不同侧面的刻画，才能使英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如何突出英雄人物的形象，小戏创作应该从革命样板戏的经验中认真学习，吸取营养。

总的看来，现在《半篮花生》的思想和艺术倾向都是好的。它展示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小戏创作的崭新面貌，也反映了越剧革命所取得的初步成果。小戏创作大有可为，前途无量。让我们为进一步繁荣和发展革命的小戏创作而继续努力！



来自群众斗争生活的艺术

——谈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的舞蹈创作

辛文彤

北京市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全队三十几名队员，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坚持小队伍，创作小节目，利用小装备，深入基层，上山下乡，为广大贫下中农演出。他们的节目，除了学习演唱革命样板戏的折子戏和唱段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自己创作的。其中的舞蹈节目，如《喜晒战备粮》、《育苗》、《旱地红花》和《扎根鞋》等等，来自群众斗争生活，有明确的思想教育意义，生活气息浓郁，格调朴素清新，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

这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刚成立时，排练了一些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演出虽也认真，但效果并不好。贫下中农说：“看你们跳得够累的，就是不知道跳的啥。”贫下中农的批评，在宣传队演员心里引起了震动。有的同志想，我们辛辛苦苦为贫下中农演出，结果贫下中农不知我们跳的是啥，这是为什么呢？宣传队领导组织大家学习《讲话》。毛主席说：“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们运用毛主席的教导总结工作，认识到这些舞蹈演出效果所以不佳，不是因为它的内容不好，而是由于当地群众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看不懂它的内容；同时，演员自己也不熟悉少数民族的生活，也不很理解这些动作是表现什么的，只是照葫芦画瓢。这怎么能发挥革命舞蹈的战斗作用呢？贫下中农认为，演一点少数民族的舞蹈节目也是应该



的，但更应该努力创作表现当时当地的群众斗争生活的舞蹈节目。于是，他们决心从贫下中农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吸取素材，进行舞蹈创作。

一九七〇年，宣传队员们在劳动中亲眼看到，贫下中农为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麦秋时精收细打，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这种革命精神和高尚风格，使他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们选择了一个最能集中表现贫下中农这种革命精神的场景——丰收场上喜晒战备粮，反映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所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创作了舞蹈《喜晒战备粮》。贫下中农看了以后高兴地说：“这个舞蹈俺们看得懂，你们把搞战备粮那股子热乎劲儿全演出来了，看了真叫人浑身添劲！”

去年春夏大旱，宣传队员们与贫下中农一起抗旱保苗，向天夺粮。在战斗中，他们看到大寨精神激发起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信心和力量，也深深为贫下中农“天大旱、人大干”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根据亲身感受，他们创作了舞蹈《旱地红花》，歌颂贫下中农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叱咤风云地征服自然的革命精神。批林整风运动以来，他们与贫下中农一起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地头田间摆战场，针对林彪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罪行，大力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创作了反映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教育下茁壮成长的舞蹈《育苗》和《扎根鞋》等。这些舞蹈，在田头、场院演出了几百场，贫下中农不仅是最热心的观众，而且成为最积极的创作者、评论家，一边看，一边提意见，帮助修改加工。

从群众斗争生活中选择素材，提炼动作，不是机械地模拟生活，而是要通过典型化，创作出比普通实际生活更高的舞蹈语汇。一九六八年，他们编排了一个大型舞蹈《抓革命促生产》，把翻地、送粪、播种、灌溉、锄草、收割等一系列劳动动作都搬上了舞台。可是，贫下中农看后说：“你们在台上演的动作倒是挺象咱劳动的样子，可是看起来不带劲。”“不带劲”的原因在哪里呢？他们联系实际，学习《讲话》，进一步认识到：“**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就是说，照搬生活现象，是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要求的。他们还认真地学习



了革命样板戏及其创作经验，进一步懂得，搞创作要深入生活，开采“矿藏”，还要善于加工提炼，把日常生活现象典型化。几年来，他们按照《讲话》指引的方向，遵循革命样板戏“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进行舞蹈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们的体会是：

第一、从生活中选取有教育意义又为群众所熟悉的素材。舞蹈是给工农兵看的，是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必须使工农兵喜闻乐见。《喜晒战备粮》的簸粮、装袋动作，《旱地红花》的担桶、浇水动作，《育苗》的撒种、育苗动作，《扎根鞋》的纳鞋底、捻麻绳动作，都是从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吸取的。这些动作，贫下中农非常熟悉，经过艺术上加工提炼后搬上舞台，贫下中农感到格外亲切。

第二、舞蹈动作必须为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和英雄群象服务。在提炼、加工生活素材过程中，应该始终把能否揭示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世界，作为构思和造型的准则。在《喜晒战备粮》中，他们设计了一个掂粮食动作。原来演员们模仿生活中的实际动作，低头抓粮、掂粮，再慢慢地撒在地上，贫下中农看了，觉得动作虽然很象，但不神气，不见思想。后来演员们改成先抓起一把粮食，掂一掂，带着喜悦心情互相看一看，点点头，表示为金灿灿的丰收粮而感到自豪，然后用一个较大动作把手中的粮食轻轻向上抛去，大家昂起头，看着粮食从空中落在场上。这一加工，贫下中农很满意。因为它既是生活中的掂粮动作，又比其更高更美，突出地表现了贫下中农掂粮时那种又喜又甜又自豪的感情。舞蹈《扎根鞋》的主题和题材也是从斗争生活中来的。宣传队员们在深入生活过程中，看到很多贫农大娘发扬过去战争年代里为亲人子弟兵缝衣、做鞋的革命传统，给知识青年做“扎根鞋”，还一针针、一线线地教他们自己纳鞋底，表现出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殷切期望。演员们决心把生活中这一动人情景搬上舞台。但生活中的纳鞋底动作，节奏比较缓慢，动作也较单调。他们为了塑造贫农大娘和知识青年形象的需要，把生活中纳鞋底的基本动作加以适当的艺术夸张，加强了这个动作的节奏和造型。比如：在表现知识青年学纳鞋底时，让她们离开小凳站起来，脚走秧歌十字步，双手飞针舞线，动作节奏由慢逐渐变快，突破了生活



中纳鞋底动作的局限，较好地表现了知识青年在贫下中农教育下继承革命传统、立志扎根农村的满腔喜悦和革命激情。

第三、正确处理源和流的关系。搞舞蹈创作，必须深入生活源泉，同时也应该学习优秀的作品。一个舞蹈的创作，一个动作的提炼，通常总要有一定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任何成功的艺术作品“不是源而是流”，都只能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人民生活中进行创作的借鉴，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喜晒战备粮》出场时的舞蹈，就借鉴了民间秧歌舞的动作，取其幅度大、节奏鲜明的长处，又吸取了战士队列教练齐步走中刚健、挺拔的特点，较好地表现了贫下中农兴冲冲走上丰收场喜晒战备粮的昂扬斗志和豪迈心情。《旱地红花》中的浇水动作，借鉴了芭蕾舞中的足尖碎步，刚劲、敏捷、熟练，有利于表现社员们争分夺秒、抗旱保苗的坚定信念。

《喜晒战备粮》中有这样一个场面：演员分成三人一组，左右两人用簸箕装粮，中间一人撑住口袋，安排了一系列装粮、撑口袋、蹶口袋的动作。演出以后有人说：“往口袋里装粮食缺乏诗意，动作硬梆梆的，太难看。”但贫下中农却说：“装粮食是检阅一年的劳动成果，装的是咱贫下中农献给社会主义的一片心，这个动作好！”同样，对于他们选用小簸箕做道具，也有人认为“太简单，不艺术”。但贫下中农却说：“簸箕是必需的劳动工具，既方便，又好看。这东西上了舞台，用得合适，看着亲切。”

同一个动作，同一件道具，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这里有一个美学观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审美观点。剥削者认为美的，劳动人民视之为丑；劳动人民认为美的，剥削阶级必然认为不美。无产阶级审美标准的阶级性与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标准，从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产生，并受斗争实践的检验。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当他们把丰收的粮食装入口袋交售国家的时候，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支援社会主



义革命的战斗豪情。这种劳动是美的，精神境界是美的，据此而提炼的舞蹈动作也是美的。小簸箕是北方农村常见的劳动工具，广大贫下中农用它精簸细拣，选最好的粮食献给国家，这种劳动是美的，精神是美的，作为道具用在这里，帮助表达了内容，也是美的。任何艺术作品，都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无产阶级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如果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内容，片面追求形式美，就会堕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泥坑。

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实践中体会到：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必须牢牢地掌握住无产阶级的标准，掌握毛主席指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他们努力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激情，而对于那些软绵绵、轻飘飘、装腔作势或者无病呻吟的东西，则坚决抵制，彻底摒弃。实际上，任何一个革命文艺作品，都是在同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的斗争中诞生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不仅仅是为了摄取创作素材，更主要的是为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艺术观，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审美标准逐渐同工农兵趋于一致。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不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他们每创作一个节目，总是请工农兵来评论、鉴定。最近，他们听取群众对《扎根鞋》的意见，深深感受到一个节目创作的成功与否，作者的世界观和艺术观起决定性作用，不仅广大专业文艺工作者要抓紧自己世界观、艺术观的改造，工农兵业余文艺战士也需要不断地改造。这种改造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在《扎根鞋》的创作中，由于一度比较多地讲究形式，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题的集中和突出，减弱了这个舞蹈的教育效果。目前，他们正在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工修改这个节目。

这个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创作方式上，坚持了宣传队员、领导、贫下中农三结合。由于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就使得他们的创作和演出水平不断获得提高。我们相信，植根于群众斗争生活土壤中的大兴县业余文艺宣传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和领导下，一定会更好地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继续前进，为贫下中农创作出更多的好节目来。



科 学 史 研 究

人类在变革物质中认识物质

李 柯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只有变革物质，才能认识物质。“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实践论》）人们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实践活动，一步一步地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跟着一步一步地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永无止境。回顾这一部人类认识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深入批判孔丘和林彪所宣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古代对物质的表面认识

人类自从制成了第一把石刀，就开始了变革物质的生产活动。后来，人类发明了钻木取火，发现了从机械运动到热的转化，第一次掌握了一种变革物质的强大的自然力，人类活动的舞台扩大了，先后发展起制陶、炼铜、酿酒、冶铁等生产部门。

粘土可以烧制陶器，矿石可以炼成金属，粮食煮熟以后可以酿成酒。从这些具体的物质形态的互相转化出发，逐步开始了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比方说，这些生产过程往往都离不开火，于是就有人认为物质世界是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而更多的人则把物质归结为几种具体形态。我国在远古时代就有了万物是由金、



木、水、火、土“五行”组合而成的认识。后来在某些书籍中更明确地提出：“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在西方，也有人把各种物质都归结为土、水、气、火四种“元素”，这实际上从外部形态反映了物质的固态、液态、气态以及燃烧时发光发热的现象。

毛主席说：“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实践论》）古代人的这些认识，停留在一些具体的物质形态上，是对物质结构和性质的笼统的、表面的认识。但它把物质世界看成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整体，因而又是朴素的辩证法的认识。

生产实践要求人们进一步掌握这些“元素”“相生相克”、互相转化的规律。用火烧木头，为什么木头会渗水、冒烟，最后化为一堆灰烬、复归于土呢？古代人在对物质的结构和性质的认识上，展开了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有些人坚持从物质本身说明物质转化的原因，要求深入到物质结构的内部去寻找这种原因。他们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构成物质的物质微粒。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墨经》认为，万物都是由“不可斫”的“端”即“点”所构成。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他们的观点也不完全相同）等人则提出：万物的本原是细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它们在旋涡运动中不断聚集，形成了火、气、水、土这“四元”。四元形成宇宙万物。万物最后又总要离散而复归于原子。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这种原子论还只是一种直观的猜测。但是，它力求深入到物质的内部结构中认识物质，否认上帝对物质的支配，这是一种唯物论的物质观。

另外一些人从现象出发，把认识局限于可以感觉到的表面现象，否认人对物质的认识需要透过现象进入本质。《尚书·洪范》里说：“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这里，润和炎，上和下，曲和直，从（铸造）和革（熔化），稼（播种）和穡（收获），都是物质形态或物质运动的某些现象。人们从事物所表现出来的类似这样一些互相对立的性质出发，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成“阴”和“阳”。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本来，“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



《矛盾论》如果认为只是某种抽象的性质的不同组合决定着物质的变化,就否认了有深入研究各类物质特殊本质的必要性,也就阻碍了人们进一步认识物质的共同本质。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则认为,在物质变化的过程中,只有人们用触觉所感觉到的干、湿、热、冷这四种性质,才是万物最原始的性质,即“原性”。四性构成四元:湿、冷为水,干、冷为土,湿、热为气,干、热为火。原性的不同组合,决定着物质形态的变化。这种原性论离开物质的内部结构,单单从人们所感觉到的物质的性质去认识物质,这就迈出了脱离唯物论基本立场的第一步。当人们进一步探索决定这些原性的原因时,孔丘的门徒董仲舒认为:“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重政》)“元”,实质上也就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非物质的“太一”。亚里士多德也最后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一种神秘的“以太”。这样,原性论最后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唯心论。

在冶金生产的基础上,在奴隶主、封建主“富贵寿考”的贪欲刺激下,出现了古代的炼金术和炼丹术。炼金术士们幻想靠物质的燃烧性、挥发性和凝固性的不同组合,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点铁成金。他们作了大量实验,发现了硝酸、硫酸、盐酸、氨、矾等化合物,发明了蒸馏、溶解、结晶等化学实验方法,积累了最初一批有关物质化合和分解的资料,为以后化学这门科学的诞生作了一定的准备。但是,他们的狭隘阴暗的“丹房”脱离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尽管他们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搞了一千多年,却炼不出一两黄金,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死胡同。

机械论物质观的兴起

十五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兴起,出现了冶金、采矿、造船、纺织等规模巨大的生产部门,逐步使用了水磨、鼓风机、纺织机等各种机械装置。在各个生产部门中,机器生产逐步取代了手工操作,人类进一步掌握了机械力为自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自然辩证法》)机械运动的研究促进了人们对于物质的机械结构和力学性能的认识。

到十七世纪,冶金和化工等生产已经积累了大量关于物质转化的新材料。英



国资产阶级早期活动家波义耳总结了这些新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批判了原性论的错误。他指出，在生产实践中，把砂石和灰碱融化在一起，生成的是再也不能被火分解的透明的玻璃；灰碱和油脂烧煮成肥皂，加热分解得出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渣块；葡萄在榨取时得到的是果汁，在发酵以后却可以得到酒精。同一种物质经过不同的处理，会转变为千差万别的东西，说明物质的构造和性质是复杂的，不是水、土、火、气所能组成的，更不是干、热、湿、冷所能概括的。后来，在冶金和金属加工工业中还发现，金属锻烧以后所得到的灰渣，往往比金属本身重得多。这又说明，灰渣决不是金属分解以后留下来的什么“土”，而是比金属本身还要复杂的物质。从这些事实出发，波义耳认为，元素应当是“某种基本的和简单的，或完全纯净的物体”（《怀疑派化学家》），是一切化合物和混合物的基本成份，是多种多样的。他还进一步根据物体在蒸馏、升华时先弥散为气体，后凝结为液体、固体，大块物体在溶解后可以通过织物的微孔等事实，提出元素可以分解为无数细小的微粒。微粒的大小、形状、运动等机械性质和结合方式不同，决定了元素和化合物的不同性质。这样，波义耳就在新的更高的生产水平上用微粒说复兴了古代原子论思想。

几乎和波义耳同时，牛顿在当时生产实践中已开始大规模利用机械力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力学的角度发展了微粒说，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机械论的物质观。牛顿认为，任何物质都由坚硬的固体微粒所构成，它们也同宏观物体以至于天体一样，都有质量、硬度、惯性等机械性质。一切自然现象如物质的化学作用、颜色等等，都是由微粒的这些机械性质和运动状态所决定的。

牛顿的这幅机械论物质结构图景，企图深入到物质自身的内部结构中去寻找决定各种现象的本质，就这个方面来说，这是唯物论。当时，为了描述各种物体的机械运动，必须把物体割裂成为一个一个的微粒，并且肯定它们的不可分性。正是在这个微粒说的基础上，牛顿第一次描绘了一幅比较完整的物质世界图景，把人类对物质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牛顿不懂得辩证法，由于他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他把微粒的这种不可分性绝对化了，否认微粒自身还有内部结构、内部矛盾，这就否认了物质是在自身的内部矛盾中运动变化着的，完全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机械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



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自然辩证法》)不变论必然导向承认上帝。微粒不可再分,谁规定的?谁制造的?只能是上帝:“据我看来,上帝开始造物时,很可能先造结实、沉重、坚硬、不可入而易于运动的粒子。”(《光学》)这样,机械论的物质观最后陷入了宗教的唯心论,同董仲舒所谓“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春秋繁露·顺命》)的唯心论的天命观没有两样。

随着人类变革物质的手段日益发展,机械论物质观的内部矛盾,愈来愈表面化。当时的工业生产,特别是冶金、煤炭、印染、玻璃等主要工业部门,都离不开燃烧。燃烧,既可以使金属变为灰渣,又可以使灰渣再变为金属;既可以使硫磺变成硫酸,又可以从硫酸中再析出硫磺。但是,机械论物质观恰恰不能解释燃烧过程中物质相互转化的现象,更不能说明燃烧现象的本质。从这种机械论物质观出发,十八世纪初,德国医生施塔尔提出“燃素说”:物体所以能够燃烧,是因为内部充满着一种没有重量、无所不在的稀薄物质,叫做“燃素”。燃烧就是释放燃素和吸收燃素的过程。燃素说第一次对燃烧现象作出了某种说明。但是,这个学说又认为,燃烧不是物质内部结构的变化,而是燃素从外面干预的结果。这就把现象当作了本质,“真实的关系被颠倒了,映象被当作了原形”。(《自然辩证法》)燃素其实就是抽象的燃烧性。它名为“物质”,实为“原性”。它完全是臆想出来的“虚假的物质”。(《自然辩证法》)当时,这种“素”几乎不约而同地充斥了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热有“热素”,光有“光素”,电磁有“电素”和“磁素”。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燃素说的创始人施塔尔不但找到了燃素,还从生命现象中找到了“活素”,照他的说法,这就是“善感的灵魂”。

辩证法物质观的发展

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蒸汽机的改进和推广把资产阶级的工业革命推向了高潮。人类变革物质的手段,从机械能扩展到热能、化学能以至于电磁能等多种多样的形式。生产的发展带来了科学的发展。十九世纪,几乎各门自然科学都在自己的领域中划了一个新的时代。机械论的物质观愈来愈不能适应这个发展了,它同整个形而上学自然观一样,“在科学的猛攻之下,一个又一个部队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自然辩证法》)



首先，蒸汽机的广泛使用要求人们透过热的现象深入掌握热的本质。蒸汽能够推动庞大的机器运动，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英国工人瓦特在改进蒸汽机的过程中发现，蒸汽力来自蒸汽的热量。正是蒸汽中所蕴藏的热量，才使机器转动起来。因此，热不是什么特殊的物质。一七九八年英国人伦福德发现，兵工厂里在钻枪炮口时，金属加工过程中可以不断产生高热的铁屑，说明热是从摩擦运动转化来的。后来为了提高蒸汽机的效率，在研究机械能和热能相互转化的过程中，迈尔、焦耳等人找到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数量关系，从而肯定了热不是什么物质，而是物质内大量分子的无规则运动。这就是“热之唯动说”。它从物质的内部结构说明了发生冷热现象的原因，在分子层次上把机械论物质观打开了一个缺口。

同时，蒸汽机的使用推动了各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出现了机器制造业，从而又刺激了冶炼、煤炭等工业的发展。这就要进一步了解燃烧的秘密，要对各种矿石作定量的分析，还要求了解生锈的原因，以延长机器的寿命。这都要求人们深入认识化学变化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发现了氧气。原来，燃烧并不是什么“燃素”的作用，而是可燃物体和氧化合的结果；生锈也同样是因为铁被氧化的结果。跟着又发现了氢，弄清楚了水是氢和氧的化合物，它们之间的重量成一与八之比。接着，人们逐步弄清楚了许多化合物中各种元素之间的比例。在这些实验事实的基础上，英国一个中学教员道尔顿提出：“所有可感知其大小的物体，不管是液体还是固体，都由无数极微小的质点或物质的原子所组成”。（《化学哲学新体系》）他认为，化学元素的基本单位是具有一定重量的原子；不同元素的原子有不同的重量，不同的性质，并在构成化合物时保持确定的比例。道尔顿还通过实验对一些元素的原子量作了初步测量，第一次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认识了原子。接着又有人把由不同原子结合成的微小的原子集团，叫做分子。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则系统研究了各种原子的化学性质，发现原子的原子量不同，表示原子的构造不同，性质也不同。于是，道尔顿的原子论发展成为更系统的关于物质结构的原子分子论。

这是对旧原子论的一大突破。在牛顿那里，不管什么物体都由千篇一律的微粒构成。新原子论否定了这幅平面的世界图景。原子构成分子，分子构成物体，“各个不同阶段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以太原子、化学原子、物体、天体）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这些关节点决定一般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质的存在形式”。（《自然辩



证法》)物质结构链条中各个关节点的不可分性,只能是相对于一定层次的。这样,原子以上的物质有了层次结构,从而为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认识作了某种准备。

最后,电动机和发电机的出现推动了人们对电磁现象的认识。随着大机器工业的发展,生产的规模愈大,蒸汽机起动慢,效率低,体积大,又不易控制,愈来愈不能适应需要。十九世纪初,伏打电池的出现为人们利用电能这种新能源开拓了前景。但是,这种电池的电量太小,成本太高。英国工人出身的科学家法拉第在自己早年的日记中就表示过,他“不满意于当时产生电量的方法,因此急于想发现电磁和感应电流的关系”。在时代的要求下,人们通过多方面的探索,终于利用电磁感应现象制成了发电机和电动机,掌握了一种崭新的变革物质的手段。

在这个基础上,人类逐渐认识了电磁现象。人们发现,光、电、磁都是连续的“场”。电磁场也有能量、动量、质量等物质属性,连续分布在带电体的周围,根本不同于机械论物质结构图景中间断的微粒。从这种连续的“场”出发,法拉第反对原子论。但是,后来的发展证明,这个“场”,尽管同物体、分子、原子等实物不同,没有机械论所要求的固定不变的形状、大小,更没有不可入性,但仍然是物质。“场”从一个全新的侧面说明了物质形态的无限多样性。到这时,机械论的物质观已经百孔千疮了。

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使自然界内部本来的联系愈来愈多地展现在人类面前。起初是机械能和热能的互相转化;以后是热能和化学能、电能的互相转化;最后,“一切所谓物理力,即机械力、热、光、电、磁,甚至所谓化学力,在一定的条件下都可以互相转化”。(《自然辩证法》)这就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各种不同的能即不同运动形式的互相转化,本质上也就是各种不同的物质形态的互相转化。不仅无机物质是这样,在人们用无机物合成了尿素以后,“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永远不可逾越的鸿沟大部分填起来了”。(《自然辩证法》)自然科学的前进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物质世界的互相联系和统一,“从形而上学的思维复归到辩证的思维”,(《自然辩证法》)为辩证唯物论物质观的形成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机械论物质观的衰落,使一些资产阶级科学家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歪曲利用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并把它推向了极端,提出一种“唯能论”来。他认为,既然能量可以用实验和测量来检查、证实,



那么，能就是一切；只要有能量概念就够了，“物质”则是多余的、可以省略的；原子、分子不过是纯粹思维的东西，只存在于哲学家的头脑中。他不懂得，本质总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科学认识的力量，就在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在自然科学中，能是用来量度物质运动的，是可以观察、可以测量的，但这毕竟只是物质某种性质的表现，并不等于物质自身。唯能论把人对物质的认识局限在可以观察、可以测量的性质上，最后又把这些性质归结为人的主观感觉，从而开启了马赫主义的先河。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

十九世纪末，电能的广泛运用，促进了人类向原子以下更深的物质层次的进军。当时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相继建立了庞大的输电网和电照明网。电器工业、仪表工业、照明技术、真空技术等的发展，为科学实验准备了电学仪器、放电管、计数管等物质条件。为了提高照明技术，人们研究了电火花、弧光放电、真空放电等现象，发现了阴极射线——带负电的电子流。电子预示了原子里头还有一个复杂的世界。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又陆续发现了X射线和钋、镭等放射性元素。X射线的强烈穿透力，几乎马上就在医学上获得了应用。天然放射性元素所释放的巨大的能量，也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到一九一一年，人们终于在科学实验中打开了原子。原子也和一切其它的物质形态一样，内部有结构，也一分为二：中央是原子核，外面是电子。后来又发现，原子核也一分为二，有质子和中子的矛盾。放射性就是从原子核里头释放出—部分物质和能量来。而且，原子里头不仅有粒子，还有场。原子核和电子，靠电磁场联系在一起；质子和中子，靠介子场联系在一起。在十九世纪，实物是实物，场是场，是两回事。现在，变革了原子，实物和场这两种物质形态在原子里头统一起来了，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深入了一大步。

变革原子中的新发现，象一声惊雷，震动了资产阶级形而上学世界观统治着的自然科学界。机械论物质观土崩瓦解，科学界陷入一片慌乱。以马赫、彭加勒为代表的一批实证主义者乘虚而入，掀起一股主观唯心论的浊浪。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唯能论的错误观点，认为物质之所以成为物质，是因为具有质量、惯性、不可



入性等人们可以感知的性质；现在，这些性质都变了，消失了，那还有什么物质呢？物质“离开了思维它和感知它的精神，是不可理解的”。（《科学的价值》）世界只剩下了人们的“感觉的复合”。这种唯心论曾俘虏过不少缺少辩证唯物论武装的自然科学家。而人们在改造社会和自然中所获得的每一个新的进步与成功，都证明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逐步“理解”的，但是不可穷尽的。

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对物质结构的新认识，反过来促进了人们对物质的进一步变革。如何打破原子核，把其中蕴含的巨大的原子能释放出来为人所用，成了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主要课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除电子、质子、光子、中子外，还陆续发现了中微子、介子、超子以及它们的反粒子等几十种新的粒子。人们还发现，这些微观粒子本身既是实物，也是场；在运动中既表现出粒子性，也表现出波性。这就是它们的“波粒二象性”。

这些粒子，一般叫做“基本粒子”。这个名词不科学。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电子和原子一样，也是不可穷尽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也表现着一个复杂而不可穷尽的世界。五十年代，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提出，这些粒子还有内部结构。他的模型促进了人们对这个新的物质结构层次的认识。以后科学的发展不断地证明：“基本”只是相对的，是相对于物质的一定结构层次和人类的一定认识水平而言的，不基本才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绝对“基本”的粒子。因此，也有人根据它们所突出表现出来的波粒二象性，统称之为“波粒子”。

在波粒子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新的性质面前，唯心论者力图作出有利于自己的结论。老实证主义的老调唱完了，新实证主义又改头换面地登场了。他们说，既然人们只能通过科学仪器观察到波粒子的这种二象性，那么，只要用各种可以测量的量来加以描述就够了，人们的认识就“完备”了。他们认为，企图深入探求波和粒子之间的关系，那是没有用处和毫无意义的。他们同原性论、唯素说、唯能论者一脉相承，拒绝深入到物质的内部结构去。结果，客观实在只不过是知觉、观察、测量，只不过是人们从观察得来的波性和粒子性的“互补”。新实证主义并不“新”，“互补”的物质结构图景仍然是以马赫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者的感觉要素“复合”的翻版。

列宁早在二十世纪初，迎头痛击了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这股反动思潮。列宁指出：“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



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物质的某些具体性质的消失，并不是物质的消失。从哲学上看，物质就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世界。这是无条件的、永恒的、绝对的。自然科学的物质观则在于认识物质的结构和性质，例如从前的原子论，后来的电子论、场论、波粒子论，这些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不断改变的，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哲学物质观和自然科学物质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把二者简单地等同起来，把物质某种特定的结构和性质看成是物质所以成为物质的根本属性，就会走上唯心论。

人类探幽索微，总想穷根究底。从物质结构的一定层次、人类认识的一定阶段来说，是有“底”的。但是从物质结构的总体、从人类认识的长河来说，又永远没有“底”，总是深入一层又一层。到了一个层次的“底”，同时也就在新的水平上开始了向更新层次的进军。

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要不断地分，不断地一分为二。分，就是变革，就是斗争，就是革命。一切反动派都反对一分为二。孔孟之徒要“致中和”，董仲舒说“凡物必有合”，林彪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也惧怕斗争会破坏统一，大谈其“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的“中庸之道”。人类变革自然、认识自然的斗争，总是同人类变革社会、认识社会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自然科学中反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形而上学，总是这样那样地为反动阶级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所利用，直接间接地为这条政治路线服务。

今天，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实践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千百万人民群众以主人翁的自觉性参加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将会促使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不断变化。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也就包含着人类利用新的自然力以改造世界的无限可能性，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深入批林批孔，不断地变革社会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地变革自然，认识自然，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